

思想領導與工作方法



著者 斯新 大林 波夫 等著

北 方 出 版 社 刊 行

思想領導與工作方法

一九四九年

思想領導與工作方法

著者 斯列波夫等

出版者 北方出版社

總經理 生活·讀書·新知

香港聯合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五四號

承印者 嘉華印刷公司

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基本定價四元八角

——一九四九年五月港初版——

K, 〇〇〇〇一——五〇〇〇

「……隨着人民革命戰爭的迅速發展，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必須對成萬萬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負責了，我們的每一項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紀律性、對羣衆利益缺乏熱情和責任心等官僚主義現象，都會影響甚至決定人民的苦樂禍福和生死。向這種官僚主義作嚴肅的和反覆不斷的鬥爭，以便把我們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改進一步，是過去一年間和今後繼續整黨整政整軍和三查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

——節錄「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

工作」一文新華社編者按語——

目次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斯大林(一)
全力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真理報社論(四)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九)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塞維克高貴的品質	多爾庫諾夫(一六)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伏蒂也娃(二三)
論經濟工作者在黨中的黨性	左爾寧(三一)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斯列波夫(三六)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四四)
論主動和完成工作的才幹	斯列波夫(五二)
論偉大而質樸的人物	雅可福烈夫(五八)
論工作的求實精神	斯列波夫(六九)
與羣衆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葛萊普涅夫(七六)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聯共「黨的生活」社論(八四)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效率與遠見	西寧(九四)
共產黨員的思想教育是黨的組織的重要任務	奧郭洛高夫(一〇二)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真理報社論(一一〇)
掌握布爾塞維克領導經濟的方法	古薩洛夫(一一五)
黨的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成功的基礎	卡佛羅夫(一二二)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朱可文(一三〇)
黨的會議是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學校	班弗洛夫(一三六)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爲着實行布爾塞維克化，至少必須努力做到若干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化，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第一、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爲國會選舉機構底附屬物——像社會民主黨在實際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樣；也不能看成爲職工會底不要錢的附加品——如同某些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份子有時對於這點所反覆說的那樣；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負着領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自職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

第二、必須使得黨，特別是它的領導者，完全地精通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第三、必須使得黨在製定各種口號和指示時，不是根據讀熟了的公式和歷史上的類比，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的具體條件——國內的和國際的具體條件周密分析的結果；同時必須顧計到各國革命的經

第四、必須使得黨在羣衆革命鬥爭底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底正確性。

第五、必須使得黨底全部工作——特別若是黨裏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還未滅絕的話——改造過來，建築在新的、革命的步調上，它使得黨底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羣衆革命化，走向在革命的精神上培養和教育工人階級底廣大羣衆。

第六、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要把這與宗派主義相混淆！）和與羣衆的最大限度的聯系及接觸（不要把這與尾巴主義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不僅不可能教導羣衆，而且也不可能向羣衆學習；不僅不可能引導羣衆和把羣衆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羣衆的呼聲，以及推知羣衆的迫切需要。

第七、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要把這與革命的冒險主義相混淆！）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不要把這與遷就行爲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便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與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底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並且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第八、必須使得黨不掩藏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而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上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第九、必須使得黨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底優秀份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這些優秀份子

十分忠實的，足以成爲革命無產階級之意向底真正的表達者；並且他們是十分有經驗的，足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真正領袖、善於運用列寧主義底策略和戰略的領袖。

第十、必須使得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會成份，消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份子，以便達到最高限度的一元性。

第十一、必須使得黨創立起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基於思想底一致性、運動底目的之明確性、實踐行動底統一性及廣大黨內羣衆對黨的任務之自覺態度而成長起來的。

第十二、必須使得黨有系統地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以執行。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或空文的危險，這只能破壞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對於黨的信任。

沒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條件，布爾塞維克化便是空談。（斯大林：「論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塞維克化」，見『真理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全力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目前，在許多省正進行着黨的代表會議，在深刻地討論着各地方黨機關的工作。代表會議是在發揚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下，黨的羣衆的高度積極性的情況中進行着。代表們滿意地談到戰後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成就，談到黨政工作的大大的改善。同局也布爾塞維克式的暴露出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機關之活動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我國過渡向和平建設的軌道，便要求各地方黨機關工作的重大轉變，要求進一步提高黨對我們一切建設地區的領導水平。黨把鞏固各地方黨的機構，提高黨內工作的及布爾塞維克對國家和經濟事業之領導的水平，加強黨機關在羣衆中的政治和組織工作等作爲主要任務之一。這個要求的實現，是與開展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聯系着的。自我批評是列寧——斯大林黨的武庫中，堅固的和經常運用的武器，密切地聯系着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天性和她的革命精神。

馬克思說，另外，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一切革命，也在於她批評自己，批評自己的同時也使自己鞏固起來。布爾塞維主義的創始者列寧與斯大林不僅在和改良主義的鬥爭中，恢復了馬克

思之批評的與革命的方法及他的唯物論辯證法，而且把它具體化了並使它向前發展了。列寧斯大林創立、教育和鍛鍊了一個黨，這是一個不知道渙散、怠惰和消極的黨。一個具有最大的積極性、堅決性和新鮮事物的感覺的黨。一個善於克服走向偉大目標——共產主義去的途中的巨大困難的黨。這樣的黨不怕亮光與批評，因為共產黨，乃是走向共產主義勝利的上升的政黨。

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發展的真正的動力，是黨手中強有力的武器。『如不能像布爾塞維克所應作的那樣，公開地誠懇地指出和暴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那我們就是遮斷自己前進的道路。但是，我們要前進。正因為我們要前進，我們就應該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重要任務之一。沒有這個就沒有前進。沒有這個就沒有發展。』(斯大林)

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最重要特徵。蘇維埃國家的勞動羣衆，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下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日益積極地參加國家的管理和經濟文化的建設。

黨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老練的武器，反對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的殘渣，並把輿論的火力指向阻礙我們前進的一切舊習氣。布爾塞維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刀鋒，是針對着黨與蘇維埃機關的工作中的缺點的，並且首先是針對着忘記黨的政治工作和對待勞動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求採取形式的官僚主義態度的現象。

列寧——斯大林類型的政治家之堅固品質，就是善於正確運用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堅強的武

器，在揭露與糾正缺點，發現和培植新事物的才能上，在對待批評的態度上，可以檢查出我們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鍛鍊。如衆所週知，黨所培養出的大批的幹部，都是有這種高貴的品質。然而直到現在，還能遇到蔑視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的個別工作人員。他們發表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處的言論，却惡意的對待任何提給他們的正確意見。在烏里亞諾夫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引證了幾個事實，證明市黨委會不是經常正確地進行對缺點的批評。有過這樣的事情，市委的個別工作人員在領導各種會議的時候，竟要求發言人事先交出講演稿進行檢查。在烏里亞諾夫列寧區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年青的共產黨員斯塔哈諾夫工作者格黎興同志，對區委工作的缺點作了正當的批評，這就引起市委書記巴拉巴諾夫同志的不滿，給年青的黨員以嚴厲的斥責。這樣的事實固然不多，但黨的機關不能，也沒有權利熟視無睹；它的任務是教育幹部，使他們敏銳地聽取羣衆的呼聲，關心批評的意見，勇敢地歡迎工作上的批評，不管它是提得如何的尖銳。

布爾塞維克的批評是教育幹部的重要方法。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如果我們想正確地教育幹部，我們就不應該害怕原則性的、勇敢的、公開與客觀的批評。沒有批評，任何組織機構都會腐朽。沒有它，任何病症都會深入骨髓。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幫助我們的人們的思想政治的成長，鼓舞他們前進，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甚麼地方缺乏批評，那裏就產生陳腐和停滯，那裏就不能前進。

只有發揚黨內民主，才能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上正確的教育幹部。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與

黨內民主是不能分割的。現在正在進行的黨的代表會議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好的場所之一。黨的機關的義務，是提高會議上討論問題的水平，在會議進行時，要去掉鋪張的成份。黨的領導者的職責，是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起領導作用。作報告的黨的領導人如何提出問題，如何揭露工作中產生缺點的原因，如何批評具體的保有缺點的人，對於黨委會報告的討論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事實說明，在某些會議上，報告人陶醉於某些獲得的成績，打算抹煞工作中的缺點，迴避批評。如在乍波洛日州黨的代表會議上，州委書記葉紐金同志盡力迴避省委個別委員工作中的缺點。在尼古拉城黨的會議上，討論中的許多發言，都是採取作經濟問題報告的形式。他們羅列很多數字和事實，却忽略了黨的政治工作的根本問題。這種發言的性質，妨礙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的展開。造成漠不關心與一團和氣的環境。

布爾塞維克的批評，是深刻的、工作上的、原則性的和行動的批評。簡單的指出和祇承認錯誤是不夠的。要暴露缺點產生的原因，同時需要糾正缺點的嚴肅的實際行動。正確的對待自我批評，這不僅是承認缺點，而主要的是在實踐中糾正它。正因為如此，致慮代表會議上和總結選舉會議上的一切批評意見和建議，歸納起來，作出實行的方法便非常重要。為開展批評而鬥爭，是迅速糾正缺點和今後提高一切黨的工作的保證。

黨的代表會議是在羣衆的政治與勞動高漲的時期，在經濟與文化建設有巨大成績的時期進行着。

但是布爾塞維克不應因成績而自高自大，他們是不停留在已經獲得的成績上的，我們的成績愈大，新的前提就愈多，就愈迅速的前進，那麼工作中的要求也就愈高。黨的代表會議的結果，應該使黨的機關更加團結和善戰，更加提高自己在動員勞動人民、去完成我們偉大的領袖與導師斯大林同志、在我國祖國和黨的面前所提出的、偉大的任務中的作用。（秋林譯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真理報社論）

論忠誠與老實

忠誠、老實——這是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寧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塞維克在其工作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塞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甄別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寧）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塞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你因為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

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噁舌者和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甯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上，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利益出發。

布爾塞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創造性的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蘇維埃羣衆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虛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地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伊凡諾夫負責的某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的』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

夫個人就得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木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它揭發出來。

雖然類似的情況為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夠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業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他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露的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的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分，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老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盡力超過完成國家所給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熔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為國家、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

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塞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它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牠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鎗樓看得高過國家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耍狡狴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完成國家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可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膽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性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塞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塞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地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爲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不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

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甯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地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鬥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裡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吹自擂與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够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醜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非布爾塞維克的風習。誰接受了錯誤的選擇幹部的的方法，誰就替那些領導集團造成有利條件，便於他們以親密的小宗派、行幫（其成員盡力和平共居而不相互批評）來代替負責的工作人員。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誠實的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

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爲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爲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職權，蔑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於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的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

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做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地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人的，……我們中間，誰要是以這種或那種放慮。認爲：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最好不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實實地，按照布爾塞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着手也不

亂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你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監督，沒有執行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地提出方法糾正它。沒有執行完善而熟練她加以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塞維克對所負責任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僅此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地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要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塞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塞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甯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做倣之心的人。

（齊生譯自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塞維克高貴的品質

我們生活和工作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完成，以及由社會主義逐漸向共庭主義過渡的時代。爲更加光明的將來的前途所鼓舞着的我國勞動者們，表現了極大的主動性，及日益不斷增長着的政治的和生產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在斯塔漢諾夫運動底更高的形式中，在工業和農業各部門無數革新者底生產業績中，在蘇聯學者、文藝工作者底成就裏，都得到自己的表現。蘇聯人民底多方面的才能是日益廣泛的展開了，因爲蘇維埃制度給我國人民底發展及創造勇氣以無限的可能。

我們的黨，是革新者底黨，革命者底黨，這個黨敢於推翻陳舊的標準，而接受新鮮和前進的事物。

顯然，一種新鮮的事物，在生活中被接受，並不是自流地、自發地，而是在緊張的、不斷的鬭爭中形成的，扶植一種新鮮的事物，以一切力量鼓舞它，給與它以一切生長和形成的條件，這便是每一個布爾塞維克底義務，尤其是每一個黨底領導人底義務。

斯大林同志把對新鮮事物的感覺，稱之爲每一個布爾塞維克工作人員底高貴品質。然而掌握這種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什麼意思呢？這首先就是說要善於看到未來，不是墨守成規，而是依靠那種雖然幼小，但都在上昇着的事物，這就是說，不要滿足於已經獲得的東西，而是不斷地向前進步。

有許多黨的領導人總是抱怨說：日常工作佔去了他們的全部時間，這就使他們沒有可能深思熟慮地去考慮本區、本省的發展前途問題。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這種現象發生在這樣一些人們的身上，他們企圖把一切事情都自己親手去做。他們不善於配合那些在他們負責領導下的各個不同的工作部門的工作。黨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包辦一切，代替一切。他是一個政治領導者，他底責任在於把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等各機關的一切力量推動起來，給以需要的方向，並督促他們在實踐中堅決的執行決定。只有這樣，一個黨的領導人才能從瑣碎的、次要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而集中精力在那些主要的、決定本區或本省未來發展的工作之上，深思熟慮這些發展前程，去利用經濟上的可能性。

在遭方面，一個區或一個省的計劃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要製訂計劃，不單是只照顧到今天的任務，而且要看明天，這就是說，在每一個區的經濟發展上要執行一定的政策，計劃就是這樣經濟政策的表現。那麼全心全力去攪各區發展前途的黨的區委和省委，他們就是做得對了。

例如，去年聯共黨莫洛托夫省省委，召開了一個討論發展本省生產力問題的科學代表會議，全國著名的學者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莫洛托夫省有什麼天然寶藏可以開發？那些工廠必須首先建立起來？工程師和技術員應該按着什麼方面進行工作？諸如此類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問題，該省的工作人員都

得到了必要的答覆。正因如此，黨的領導人才能够在自己底面前，提出具體的任務，推動黨的和財經的機關去解決最急迫的問題。

向前看，這就是說，對自己已經做過的東西給以估價，但並不是把它當做固定的總結，而是把它當做向前推進運動的出發點。有些領導人，當他們給某一運動做總結時，總是忘記事情底這一重要方面。他們通常只是把積極的和消極的現象加以羅列，痛罵缺點，提出許許多多的數目字。在這裏便忘記了關於新鮮事物底生動活潑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任何一件大事中都有的。而發揚這種新鮮事物，澈底分析它的生產條件，把社會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這就是爲更形加速的，前進的運動向新的勝利之發展，建立了補充的源泉。

自然，當一個新的事物在它開始發生時，是不容易覺察出它的萌芽的。列寧在他的『偉大的開端』一文中寫道：『當一個新鮮的事物剛剛出生時，舊的總是存留下來，在某些時間內，還比新生的強大，這在自然界中和社會生活中總是如此，……我們急需仔細地研究新生底萌芽，極其關懷地去對待它，用一切方法幫助它的生長，並「扶育」這些幼小的萌芽。』

爲了及時的發現新鮮的事物，爲其迅速的生長奠下基礎。就必須具有敏銳的感覺。有時，某一件事情，在我們按其長處給以估價之前，常是經過巨大的誕生的痛苦的。那些懼怕份外的操勞努力、慣於和平平平，按着舊秩序生活的人們，靠得住就是漠不關心新鮮事物的罪人。很自然的，這樣的工作

人員對於新鮮事物的感覺是遲鈍的，他們是更多地傾向於陳舊的東西，他們早晚有變成墨守成規的人，保守主義的危險。

就拿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工作人員做例子吧。他們成年成歲地把許許多多的寶貴建議擱置起來，而這些建議如果實現的話，就能額外地給國家以幾千普特砂糖及節省千百萬盧布的開支，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把狹隘的本位利益置於全國利益之上，他們不但不支持這種寶貴的倡導，而且相反的去阻礙它們。甚至於在蘇聯輿論界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之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仍然繼續存在着對待新發明拖捱不用的現象。可以設想，在這些地方墨守成規及保守主義是多麼根深蒂固。而這是爲什麼呢？這就是因爲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做領導工作的人員，脫離了實際生活，失去了對新鮮事物的感覺。

工作經驗，與羣衆的聯系，善於從國家的要求出發去對待每一件事情，這些東西便給一個工作人員以對新鮮事物的敏銳的感覺。幾年以前，庫爾斯克省的幾個集體農莊開始採用了勞動組織之小組制。當時省委領導人常常到各區裏去，仔細傾聽集體農民的意見和他們底提議。省委決定把這些零零碎碎的經驗普遍化起來，而且決定這個工作必須由省省委來做，因爲省委和所有的區，所有的經濟的，蘇維埃的、黨的組織聯系着，因爲正是省委手裏牽着主要的領導線索。

省委當時就全心全力地研究了勞動組織的小組制。在集體農莊內給每一小組固定了經常由他們耕

種的土地、農具和牲口。給各小組固定了由他們管理的作物：栽植作物，菜蔬，有時還規定了種植穀類作物，勞動償付中的平均主義被消滅了，收入按每一小組所獲得的收穫進行分配；獲得較高收成的集體農民小組，得到較高的報酬，而獲得較低收成的小組，則得到較低的報酬。

在研究勞動組織小組制的時候，集體農莊農民的經驗又被黨的領導人底政治經驗所支持並被導入了正確的道路。從一開頭，省委就了解不但有必要的一切方法促成新鮮事物的產生，而且要幫助它形成、生產和鞏固。省委不止一次地寫信給集體農莊主席們、集體農莊黨的書記們、村鄉地方黨的組織、小隊長們，告訴他們如何正確的組織勞動，如何採取按件工資制，如何分配收入，並如何去廢除非個人負責制及平均主義。

很可惜，並不是到處都能很注意地傾聽羣衆的呼聲，並把羣衆的經驗普遍化起來。有時便只局限於去寫些鼓勵個別斯塔漢諾夫式工作者及個別單位的決定和指令，形式上給自己保了一險，以求避免受到工作不活躍的責備，但實際上對於採用和鞏固新生事物方面，並沒有做任何工作。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不能發揚主動性，而只會停滯它、絞殺它。

我們黨的組織，在深入的利用斯塔漢諾夫運動前進形式及新的工作人員方式等方面，已經積蓄了巨大的經驗。這些經驗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說，必須每天去幫助那些採用新的勞動方法的人們，給他們掃清被墨守成規、保守主義所阻塞了的道路。但是，只去幫助一二個斯塔漢諾夫式工作

者還是不夠的，先進者的經驗必須為全體工人所享有，只有這樣，這種經驗才能獲得全民的意義。雖然如此，然而收集斯塔漢諾夫運動的經驗，把這些經驗普遍化，加以傳播，遠非所有的地方都做到應有的程度。一般來說，這些進步的經驗，很快就被頌揚一番，然而並不是都能找到其中細膩的、科學技術的根據，而這種根據恰能够成為生產中的工作方法和規則。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從黨的工作本身發生的，黨的工作就是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中團結勞動者為着新的勝利而進行鬥爭。黨的活動是不能容忍定型和停滯的，創造的熱情在一個黨的工作人員來說，是固有的，他批判地估計自己底經驗，經常地檢查自己底經驗是否適合於新的任務和要求。一個具有對新鮮事物感覺之黨的工作人員，從來不漠視別人底經驗，並不以學習和掌握別人底經驗為可恥。有些所謂『絕無錯處』的工作人員，他們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向別人學習，也沒有誰值得他去學習，他們把自己底眼界只局限於個人的經驗之內，把自己封鎖在自己底有限的學識的圈子裏，於是他們就老是僵在一個地方了。

當一個工作人員不斷地去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時候，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就日益鋒利和敏銳。馬列主義能幫助我們認識在胚胎中的新生物之萌芽，並按其長處去估價它們。這種感覺是永遠生動活潑的，永遠發展着的馬列主義本身產生出來的。馬列主義教導我們說：在新鮮的和陳舊的、垂死的和新生的、衰老的和發展的之間的鬥爭，就組成發展過程的內容。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個布爾塞維

克就能深刻地認識黨底要求，黨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底要求，就是要求我們注視生活中出現的新生的事物，就是要求我們不去依據那些陳舊、衰老的，而是依靠年青的、發展着的事物，學習馬列主義的意義，對幹部的實際活動來說，是無法估價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用預見和辨認前進事物的能力，以及爲其形成和生長創造一切條件之能力武裝着布爾塞維克。

在我們的社會裏，正在進行着新鮮事物之誕生，及其與舊的事物鬥爭之不斷的、羣衆性的過程。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摧毀衰老、落後事物的方法，就是爲培養新生、前進事物而鬥爭的方法。斯大林說：「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這個真理是純潔的、明澈的，有如泉水那樣純潔、明澈。」展開對落後的批評，責備墨守成規的份子，布爾塞維克就是給新生事物及其鞏固肅清道路。

戰爭結束以後，在黨的面前，出現了新的任務。蘇聯人民正全心全意努力爲祖國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們每天都給自己勞動方法帶來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使我們能更迅速、更有信心、更順利地向前進步。及時地發現這些新鮮的東西，擁護它，使它廣泛地傳播開來，任何時候也不滿足於自己的創造，鼓勵羣衆的創造熱情，這就是每一個黨的領導人，每一個布爾塞維克之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

（洵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列甯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新華社編者按：

這篇文章，是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蘇聯消息報譯出的，我們黨的、軍隊的、民主政府的和人民團體的一切能讀的幹部，都應好好研究這篇文章，並且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列甯式的工作標準，來檢查一下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知道毛主席和我們的黨中央是經常要求我們按照這種列甯式的標準來進行工作的。而毛主席自己的工作作風，正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最好模範。隨着人民革命戰爭的迅速發展，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必須對成萬萬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負責了。我們的每一項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紀律性，對羣衆利益缺乏熱情和責任心等官僚主義現象，都會影響甚至決定人民的苦樂禍福和生死。向這種官僚主義作嚴肅的和反覆不斷的鬥爭，以便把我們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改進一步，是過去一年間和今後繼續整黨整政整軍和三查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現在發表和學習這樣一篇文章，是有益的和適合時宜的。當然這篇文章裏所說的某些具體要求，在缺少新式交通工具的農村中，是不能完全實現或者是需要降低標準

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不把這些作爲藉口來原諒我們工作中的那些並非由此產生和並非不可能克服的一切不良現象，農村中散漫而停滯的小生產制度，乃是官僚主義蔓延的重要基礎和掩護物，這正是我們在農村環境中工作的同志們所應當警惕的。因此，我們應當更加注意地與經常地來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毛主席說：應該經常掃地和洗臉，以免這些政治的灰塵和政治的微生物來蒙蔽和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就正是指出了這種必要性。至於在我們同志進入城市以後，如果仍然保守着那些本來就必須堅決反對的農村式的官僚主義習慣，就更是不可容許的了。本文如下：

蘇維埃制度保證我國全體勞動者有最大的可能去參加國家的管理，列寧把這看作是我們國家機關底力量所在。認爲這使我們國家機關底活動，有不斷改進的可能，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蘇維埃機關，是爲人民底利益服務的，爲鞏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服務的。

列寧從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就非常重視改進蘇維埃政權機關底工作，他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最廣泛的勞動者階層自覺地參加蘇維埃機關的工作。

列寧非常重視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寧在給斯大林的手札中講到：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底改組時，把下列幾項工作提到第一位，作爲改組後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底迫切任務，這幾項工作就是四出調查民間的疾苦，

與拖延現象作鬥爭，用革命手段與各種瀆職作鬥爭。

列寧要求我們，毅然決然地迅速地絲毫不苟地執行蘇維埃政府的法令和指示。

列寧警告說：「最小的非法行爲，對蘇維埃秩序的最小的破壞已經是一個空子。而爲勞動者底敵人所馬上利用……」

列寧在力求人們遵守革命法律時，嚴厲地同賄賂行爲作鬥爭，他把這種行爲叫作沙皇制度底該咒咀的遺物。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莫斯科人民法庭會審理幾個受賄者底案件，法庭證明了被告有罪，却判決很輕，列寧對這樣的判決，大爲震怒，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不把受賄者槍斃，而給了這樣開玩笑似地軟弱而輕微的判決，這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乃是可恥的行爲，這類受賄的同志，必須交給輿論裁判，並開除出黨……」

過了幾天，列寧寫信給司法人民委員，在信上他建議道：「立刻趕快提出一個法案，規定對於賄賂（收賄賄賂以及其他賄賂行爲等等）的懲罰，應該至少是十年監禁和十年苦役。」

列寧再三力求國家機關底精簡，要求工作上的巨大效率，並且堅決同那些以冷淡的拖延態度來代替活潑的工作作風的官僚主義者作鬥爭。

爲了要大家不僅在牽涉國家利益的場合下而且在牽涉個人利益的場合下都嚴格遵守革命的秩序和

法令，列寧曾進行了有系統的頑強的鬥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他寫信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說：

『我命令你立即把人民委員會管理處所收到的一切對政府機關及人民的控訴報告給我，其中書面的控訴，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口頭的控訴，則限於四十八小時內報告。』

管理處對這些控訴應有特別的登記，同時對管理處辦公室主任，應給以縝密的監督，以執行我對這些控訴的決定。』

檢查執行——『檢查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及善於挑選人員，這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在工作上勝利的
基本條件。

列寧認為確切地劃定各個工作人員的職責，確定『每個担任蘇維埃任何職務的人為執行一定的明白而含糊地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和實際工作所應有的明確責任。』是正確組織蘇維埃國家機關工作的
基本條件之一。

不論對機關也好，對個別工作人員也好，列寧始終要求獨立和負責的工作，他尖銳地斥責那種對工作無能和不願負責的現象。凡是個別工作人員及機關，企圖把自己本來可以獨立解決的問題，提交給人民委員會或聯邦勞動國防會議去解決，他都堅決地與之作鬥爭。

列寧向機關及個別工作人員一再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把每件事做徹底，做到有實際的結果。

他再三教訓我們，要爲完成所委託的工作而奮鬥，教訓我們不要停留在困難面前，不要援引阻礙順利工作的表面上的理由，他說，必須善於成十次地修正成十次地重作，但是無論如何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開始碰了壁，那就重新再來作，這樣一直到達到目的爲止——列甯這樣教導我們。

他尖銳地斥責和嘲笑懶惰、粗枝大葉、對工作隨隨便便，對世上一切都喜歡沾一手，而又一事無成。

列甯向大家要求工作上的精確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他以自己的例子，表現了高度勞動修養底最好模範，表現了善於正確在配備工作善於支配自己工作時間的本領。

誰也不像他那樣懂得時間的寶貴，並善於珍惜它。列甯沒有一分鐘是白白過去的，他從沒有表現過急躁，但他也從沒有拖延過。早晨他總在一定的時刻來到，接見客人、主持會議、閱讀報告、並依據它們作指示、寫文章，指導當前進行的工作，而總是在正四點時闔家吃飯和休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是六點或五點半，總是充沛的精力和創造的積極性一直工作到深夜。

列甯不僅善於珍惜自己的時間，而且也善於珍惜別人的時間，列甯領導下的會議，不管到會者有多少人，總是準時開會，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遲到委員底姓名，按照列甯底吩咐都登上了記錄簿，並且註明誰遲到了幾分鐘，如果無故一再遲到，列甯就斥責遲到者警告說：再犯就登報。

列甯從不使那些在指定時間來見他的入們等候他，在稀有場合下，當他同其他先來的工作人員談

論工作，而不得不延遲幾分鐘時。他就在指定的時間把秘書叫來，要他去向等候的同志們道歉，請稍微等一下。

有一次在人民委員會開會的時間，列寧偶然經過彙報人的房間，看見整個的房子塞滿了疲倦的人們，他們坐在烟霧迷濛中，有些在下棋，有些在看報，等着叫到會上去。

列寧馬上對秘書作了一系列具體的指示，要他排好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不僅如此，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他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一個書面的指示：要他週密地排好一個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他寫道：『現在彙報人一般總要等幾個鐘頭才被召集與會。

這是醜惡野蠻。

必須做到使彙報人在一個一定的鐘點被召集。』

列寧所主持的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會議，都是在標本式的肅靜和全體出席者聚精會神之下進行的。這些會議對於蘇維埃機關底實際領導者，乃是真正的政治教育學校。

列寧在主持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這些會議時，總是盡力使討論簡短，使發言者講話明白，而且扼要，會議上的長篇大論，列寧認為是無謂地浪費時間。

列寧也批評和責難長篇的書面報告。

對於這樣的報告，列寧平常是從後邊從實際的建議看起，如果發見這些建議是實事求是的，他才

把整個報告看完。

不管他所坦負的國家事業多麼巨大，列寧總找出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簡單的和細小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列寧逝世第一週年紀念日，發表於『工人報』的一封信上，指出了列寧底這個卓越的特點，他寫道：『從來也不拒絕細小的工作，因為小事是大事的根——這就是列寧底重要遺訓之一。』

列寧把他自己的指示要求個人，例如同工作上的有修養的習慣和態度結合在一起，他慣於實事求是地和獨立地解決問題，慣於對所執行的工作負責，慣於把政府所通過的決議與法令確切和適當地付諸實施。同時在蘇維埃政權機關工作中，樹立起革命的紀律和秩序，他耐心而又頑強地鍛鍊了一批新型的國家工作人員。

列寧在其寫於重病時期（一九二三年一二月間）的最後兩篇文章裏，再度專門論述創立模範的國家機關的問題，列寧在『寧缺毋濫』這篇文章裏指出道：

『我們無論如何，要向自己提出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是學習。然後就來檢查，使得科學在我們這裏不再是死板的教條和時髦的漂亮話（用不着掩飾它在我們這裏却常常是如此），使得科學實際地化爲血肉，完全而且真正地變成生活底組成因素。』

自從列寧寫下這些卓越的話句之後，已經過去二十餘年了，我們偉大祖國底國家機關，在這個期

間是大大地增長了它的工作範圍，是更加複雜了，更加艱巨了，更加多種多樣了。

蘇維埃機關，勝利地執行了它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中所担负的各項任務。

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時期，表現了特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和效率；我們各個經濟的和行政的人民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在戰爭日子裏進行了巨大而又困難的組織工作，並且保證了紅軍為粉碎敵人所需要的一切。

現在在愛國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新的和平建設時期，我們國家面前出現了新的巨大的任務，這就對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底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說：

「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更為重要的任務了，這個勝利是我們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所取得的，這個勝利為我們國家新的偉大的繁盛，為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之進一步提高，開闢了道路，在我們面前展示社會主義建設，如此規模宏偉的遠景，以及蘇聯力量如此巨大增漲的可能性，過去從來還不會有過。」

為了執行這些任務，需要進一步改進蘇維埃機關底工作，使得它在新的和平條件下也工作得「像一個好的時鐘一樣，合拍而且準確。」（斯大林）

論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

布爾塞維克黨化費了許多精力，來教育蘇維埃經濟工作者幹部。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深遠思想和無限忠誠，便是這些幹部最寶貴和決定的品質。受過布爾塞維克教育的蘇維埃經濟工作者，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建築在全心全意爲國家和人民利益服務的基礎上。生產任務的先期完成，對於工廠經理、技師、車間主任、技工說來，乃是他們高度精神上的滿足。先進的布爾塞維克經濟工作者，並不滿足於計劃之一般完全，他將自己的全部精力、自己的實際經驗和集體的努力，放在不僅完成而且超過國家的計劃、並減低生產費上。

經濟工作者之布爾塞維克黨性，就在於他絕不滿足於既得的成果，他經常在自己面前發現尚未解決的任務，不固步自封，而是向前發展。這一特點是我們人民所固有的。

蘇維埃人對獲取新成就之難於抑止的意志，反映在社會主義競賽的結果中。這從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州的企業超過了五月計劃，其生產品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在六月十五日，差不多有五百個企業先期完成了六月份任務。莫斯科州的礦工在五個月內超過計劃而多產了數萬

煤噸。州的集體農民們超過了穀物播種計劃，完成了馬鈴薯和菜蔬的種植。

蘇維埃經濟工作者的特點，在於他不圖「安閒的生活」，相反的，他樂於沸騰的活動。他的黨性在於他決不隨波逐流，而是頑強地逆着困難而前進，尋找和發現進步運動的道路。

克拉斯諾霍姆紡織複製工廠領導者，確屬於這一類人物。這一工廠的工人聲明希望和準備先期完成一年的計劃。但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實行許多嚴重的措施：嚴格提高生產修養，改善技術過程，建立和安置生產中的新的聯合染洗機，設置準備產品時的機械化的轉遞，組織有傳送裝置的運輸。複製工廠和黨組織的領導者估計，這些措施的真正實現，不僅有了一般地超過計劃的可能，而且爲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創造了實際的條件。新機械的裝置和工廠的擴充開始之後，結果，他們能每晝夜出產這樣多的紡織品，這個數量曾經籌劃只有到一九五零年才能完成。

蘇維埃的經濟領導者不把自己與企業的整體分開，由此來達到我們工業上的成就。他們與技師們、先進的工人們商量，盡量支持和鼓勵有創造性的人們，總結與運用斯達漢諾夫者的豐富經驗。

『巴黎公社』工廠的裁切工人馬特洛索夫同志，他自己的工作合理化，並取得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大大超過了戰前的指數，但這一個人的成就沒有滿足他。他知道車間許多工人勞動生產率不大。

馬特洛索夫同志提議製訂一個廣泛採用保證使每個工人生產率增高的進步勞動方法的計劃。馬特洛索夫同志建議的價值和特點，在於他不僅是從個人利益（他的勞動生產率保證他高度的工資）出發，而

且願望取得這樣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落後的工人能够趕上先進工人的水平。

「巴黎公社」工廠的經理立特曼同志和黨組織書記楚魯索瓦同志，用黨的精神對待瓦西里，馬特洛索夫的建議。他們支持了馬特洛索夫的倡議，幫助他研究其建議，吸收工廠的全體人員來重視這個事情，並且在實現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倡議下，使許多落後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先進工人的水平上。『巴黎公社』工廠在黨的組織與刊物的幫助下，把馬特洛索夫的倡議當作我們全國的資產。

說到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上的黨性，我們所指的是工業上的領導幹部，不是一般地努力於超過計劃，而是爲此而採用了新技術與最完善的工藝學的方法。

黨的組織負有使命，以深刻了解擺在經濟工作者面前的任務的精神，來經常地教育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對待事情，對疲塌與保守的不可調和性，對爭取新而又新的技術高度的經常努力，產品出產的盡量增加，從蘇維埃工作者日常負責的國家工作中有機地流溢出來。

布爾塞維克——經濟領導者的出色品質之一，就是對自己企業中工人、技師、職員的需要之敏感的關切。在很好關懷集體需要的企業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工作上的成就。

然而，可惜，也還有這樣的領導者，他們脫離工人，不知道他們的需要，工人很難遇見這樣的領導者，並且從他那裏難以得到必要的幫助。而這種經濟工作者的工作，照例總是擱不好的。

戈爾素諾夫同志担任經理的墨基其工廠，經常的沒有完成生產計劃。這個工廠應當爲莫斯科的地

道電車製造車廂。但，雖然政府所規定的期限早就過去了，地道電車連一個車廂都沒有接到。

在這個工廠裏，沒有布爾塞維克的制度，而主要的是對人沒有黨的態度，冬天工人們不得不在冰冷的車間裏工作，而工人回到公共宿舍時，也沒有起碼的休息條件。在公共宿舍裏又冷、又擠、又擠、又擠，經濟和黨的領導者蔑視工人的需要，不關心他們。

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當黨委托他關心工人階級的需要時，應認為是光榮的事。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應把技術、組織生產的問題與爲改善工人與職員的物質生活設施的日常鬥爭配合起來。

列寧——斯大林黨，以對國家的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來教育蘇維埃經濟工作者的幹部。

我們的經濟工作者，把國家的利益提得高於一切。可惜，在經濟工作者中也有這樣的人員，他們力圖隱瞞企業的能力，把計劃定得輕鬆些，他們有時走上欺騙的道路。他們僅僅是爲了獲得獎金，而把未製成的產品寫到製成品中去等等。也有這樣的經濟工作者，他們不是節約地消費原料和資料，而是力圖預先領取超過真正需要範圍的原料和資料。他們爲了個人的安逸，在倉庫裏保存着各種巨額的物資貴重品，他們在裝備等等上對計劃機關作了誇大的聲明。這些自私自利的經濟工作者，沒有蘇維埃國家利益的黨的認識。他們像縮手縮足的小商人一樣，看不到離鼻子稍遠的事情，並且只爲狹隘的本位利益和自己個人利益而生活。雖然這種人不多，但要堅決揭露、批評和以國家利益的精神來教育他們。只有在自己行動上由國家利益出發的領導者，才能稱職。

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不能把自己閉塞在僅僅是生產利益的圈子裏。如果他的政治眼光愈遠大，愈能更好地分析國內與國際條件，那麼他在解決生產問題上會更嚴肅、更覺悟、更深刻。工廠經理負有使命日常教育其下屬的幹部，發展他們愛國義務感。經濟工作者只有在自己是一個有足夠政治教育的人，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完成這樣的使命。經常從事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準，真正精通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是布爾塞維克經濟工作者的必須的責任。經理、車間主任，不論大小的生產領導者的崗位——這同時也是黨的崗位。

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是蘇維埃領導者所必須有的品質。它應當經常伴隨着經濟工作者的活動，它應當成爲解決大小任務的鑰匙。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在政治教育與馬列主義的鍛鍊的條件下，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才會站穩自己的崗位。

（伊譯自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的「真理報」）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均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策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有原則的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塞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該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意見的

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擔負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種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塞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錯誤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

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分落後的知識份子，還是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對媚外的奴顏婢膝事實謀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用的、或能够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與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的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

他們有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的危險。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〇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的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永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爲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人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塞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諾鑛煤礦』托拉斯和『卡堂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採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反國家利益的行

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誠懇地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塞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至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塞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塞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害，因而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上腐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的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會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

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他的工作職位，按他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他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的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發與糾正，對教育作為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罕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分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分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性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罕省黨委的委員們，在對省委有許多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

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爾塞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覩，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從前曾在遠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為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地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的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塞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是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

（亞天貳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共產黨是對於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塞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的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寧全集七卷三百零五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塞維克黨人是沒有因緣的，列寧和斯大林責備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份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已目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驕傲起來，百事不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塞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昏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楚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始，可是當它不被人所注意的時候，它就發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能害瘡，但如果這個瘡開始腐爛時，就可

能變成不治之症。』（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品質——當缺點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辯詞來掩蓋或者逃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就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塞維克的黨不能以個人利益或者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人或事物，而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地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人不能夠逃避責任，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必須盡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困難悲嘆，而不真正的同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分析缺點，那麼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暴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為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發我們的瘡疾，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從家庭、親

友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及時揭露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位」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的適用於好的和不好的工作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為這種嚴肅精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專對付懶惰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害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是從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薩拉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托拉斯站，在很長時間中都認為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作得挺好，他底領導能受到無限讚揚，但沒有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自滿自足起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會先收割完。」這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延了被他供給拖拉機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是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保險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擊」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作出的決議很快

就被忘記的話，那就會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這樣的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為不能不受到追究。在這一方面起着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單這樣還不夠，斯大林曾指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發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羣衆在積極份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缺點的調和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中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暴的『負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不會研究事物的本質，沒有正確的配備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收懂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羣衆的經驗，不考慮黨工作人員集體的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分子。而領導上的任務，恰在團結積極分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備行動，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爲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含有教育的成份。好的指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

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為教育的方法，因為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上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過失時，領導上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聯共（布）烏得慕爾特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依叶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托拉斯，他本人行為不正，欺瞞上級，而省委不去揭露這種工作人員，反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護他們的缺點，姑息他們的自尊心。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個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息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只是要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為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想輕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功之後，就仰首看天，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者他是為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這種嚴肅性對他有甚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有那些真正不受官僚習氣的領導人，才有可能的。在工作中沒有

原則性，對自己行動不約束的工作人員，就使自己同那些阿諛奉承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人員，在同缺點和罪過作鬥爭中，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裏互相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會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至引向相互原諒錯誤。他說：『舉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把事情攪壞了，但是李四不願批評他，不願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為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犯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就能原諒我——李四，因為怎麼能保險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氣氣，和平相處多好呢？讓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麼？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人，假如我們爲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顯麼？』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裏就沒有嚴肅性，那裏就容忍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忍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吉支盟員共和國的國家檢查機關，在檢查該共和國農業供給

處的工作時，發現了亂分配貨物，私自供給，違反財政紀律的事實，而該供給處把所規定對於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工廠、作坊、集體農莊、供給機器及機器零件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吉爾吉支共和國農業部的領導人，明知供給處工作做得很不好，而且自由主義地對待他底某些工作人員，沒有指出他們這種活動的重大損害，沒有表現必須的嚴肅性，如果問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該農業部的領導者本身，有時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行爲，他們不按規定，比如把配給機器拖拉機站、農業技術學校及普通學校的很大數量的布疋浪費了，而且把一部份分給農業部及供給處的工作人員了，還亂分了其他的物品。

由於這些緣故，該部的領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和下級供給處的工作人員有了牽扯，而在同他們工作中的嚴重缺點作鬥爭中，就失去了武器。這一點說明了：同自己監督下的人員的互相關係中，領導者思想上的純潔，是如何的重要啊！

黨的工作人員，是給各個工作部門的幹部，在工作上指示方向的，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的黨的監察人員說過的話，對於黨的工作人員，比對任何其他的人員更爲重要。斯大林同志說：『他們應該純潔無瑕，追求真理，以求他們不僅能夠有形式上的權威，而且要有思想上的權威，來審查和教育別人。』

思想教育教育幹部在工作中的嚴肅性，及對缺點之不調和性的最重要條件，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能够深刻了解黨的政策，而因此提高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和對國家義務的感覺，只有自覺的和

思想會受鍛鍊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對黨的義務，自己對黨所負的責任。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高度的嚴肅性，過去會是現在也還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礎。

（蘇瑛譯自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論主動和完成工作的才幹

列寧把布爾塞維克的黨稱爲革新者的黨。它總是不斷地推翻和摒棄陳腐的事物，而對於建立起來的和檢查過的經驗，對於傳統，却始終是慎重的。黨經常研究人生的過程，觀察新的現象，發現新的要求與新的問題，並及時予以適當的解決。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列寧——斯大林型工作人員的高貴品質。

對新鮮事物感覺的表現，就是布爾塞維主義的主動性。

衆所週知，集中領導是布爾塞維主義的最重要的原則，遵守這個原則，就是嚴守紀律，明確地與無條件的執行上級機關的決定。然而嚴肅的集中領導，不但不排斥，相反地却期待着地方的創舉和主動。

布爾塞維克黨，它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是要求地方組織及其領導者發揮獨立的、才幹的、精明的主動。列寧說過：總路線的一致，在基本上，在實質上是不抵觸的，然而在『細部的工作上，在地方的特徵上，在處理工作的方法上，要能運用多樣的手法……』

如果一個領導者願意成爲一個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組織者，就應該發揮廣泛的主動。捷爾仁斯基說過：『實行政策的總路線，無論經濟領導政策，或是一般的政策，應當有充分的信用，要負完全的責任，並且要能發揮主動。不能拘泥於「一切照辦」的嚴厲命令中。』

無論多麼詳細的一道指令也不能顧及到各地方所有的一切情形。這就是說，地方組織及其領導者應該展開普遍的獨立工作，要發揮主動，提出新問題，不能每件事情都等待上級的指示。一個政治領導者，不能藉口說沒有指示而不去做。

發揮主動——就是接受上級的指示如同出於自己的一樣，不是機械的，而是創造的對待它。人生是多樣的、複雜的。同一的指示在不同的環境下，就要變更其執行方法。活的、實際的工作能不斷地提出新問題；即或是一個舊問題在變遷了的環境下，也要經常用新的方法解決它。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領導者的任務——在實現工作中基本方向的節省人力物力的總路線時，要從周圍的一切事物中學習觀察與分析，學習尋找最好的辦法，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布爾塞維克領導者應當吸收並利用過去經驗中的一切精華，善於在當前的具體的環境中，以創造的精神發揮積累的經驗，並且用它再來充實自己的經驗。

培養我們的幹部具有主動精神，需要提高他們對工作的責任心。列寧說過：管理和領導工作必須向「個人分工不明確的散漫性的統治，以及由此產生出來的完全不負責任的現象，作無情的鬥爭。」

規定每個工作人員負一定工作的專責，是造成發揮主動的條件。

逃避及企圖推脫責任的畏縮鬼們，不會發揮獨立的、大膽的主動，不會推進工作的。這類人很像塞德林小說中的別列德良金，他是本着『不哼不哈』的原則做事情的。可惜，我們之中還有一些工作人員，雖然相信手創之可貴並且能帶來利益，但是總想逃避責任，不支持自下而來的創舉與主動。

在羣衆中激發創造性的主動、採納進步的創舉、可貴的發起並廣泛的普及它，精密的研究新出的萌芽並盡量幫助它們發展——這是布爾塞維主義領導者的職責。

教育幹部具有英勇的創舉和主動——就是和傲慢自大、作威作福鬥爭。驕傲自大、大吹大擂、其中必將引向自安自慰、洋洋自得、馬馬虎虎、喪失警惕的許多危險道路。而停滯不前、保守頑固、盲從祖先傳統——正和它們是一道的。

布爾塞維克黨斥責以自己的過去而作威作福、停止創造性的工、作停止前進的工作人員。我們不應該忘記：只有健全的、不以工作成績爲滿足的、懷着不可遏止熱情前進而不停頓的地方，才會產生主動。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每一個蘇聯人每天都應把自己的工作做一個總結，大膽的檢查自己，批評自己的缺點，周密的思索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達到更優良的成績。一個領導者更應如此。

布爾塞維主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助長前進的力量。大膽和公開的批評會幫助順利的克服工作中的困難與缺點。誰怕批評——誰就是遭人卑視的懦夫，對於他們改正缺點或是掩飾缺點都是無關

重要的。列寧說過：『應該善於大胆地承認錯誤，爲的是和它作更堅強的抗爭。』

只有和羣衆、和生活聯系密切的人才善於發揮主動。脫離羣衆的、感覺不出人生脈搏的領導者，就不善於接受某一主動，更不會指示必要的方向。一個工作人員無論在任何崗位上都必須要和人民商議，考慮他們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教導過：『領導者看事物單從一方面——從上，他們的視野是有限的，羣衆看事物、事變，單從下面，他們的視野也在一定的尺度內，也是有限的。』爲了能正確的解決問題，需要把這兩種經驗團結到一起。只有在這個時候領導才能正確無悞。』（斯大林）

布爾塞維主義領導者必須珍重被領導人們的經驗。依靠羣衆的工作人員，會使自己的經驗加上羣衆的豐富經驗。他的指令和指示會變成洶湧的力量，因爲接受它的時候不像官僚命令，而是生活本身提示的措施。

我們不應忘掉主動是離不開實際組織工作的。最好的創舉，任何可貴的發起，如果得不到求實的、組織的工作的支持和保證的話，就會被腐化和消滅。讓我們來怎樣講那些死守着主動，而不想任何辦法來實現它，或是半途而廢的工作人員呢？我們有這類事實，而且不在少數。

舉一個例子吧！今年三月在斯莫連申市發起集體農莊建設者運動——他們必須在十月革命三十週年前完成集體農房屋屋的建設。這是具體的任務。但的區領導者們除了嘴皮上字面上說說寫寫以外再沒有做別的。譬如：羅斯拉里斯基區的領導者謝爾什爾且夫同志和庫波里雅諾夫同志連手指甲都沒接

觸，還談什麼保證完成應諾的任務呢！此外，自從他們在集體農莊建設者區域會議上說了一些漂亮的話以後，根本就再也沒理會莊民房屋建設工作進行得如何。至於許多農莊的建築隊只在書面上存在，並不履行採取的職務，還值得可疑的嗎？

又如這麼一個事實：今春在坡爾塔瓦省發揮了很好的一種主動——決定在省內每座農莊修一架平常的瞭穀台。甚至在省委決議中都記上了：「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在省內每座農莊裏修一架瞭穀台。」然而省委工作人員並沒把工作做到底，並沒制定一個實踐的檢查，而使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這是組成布爾塞維克式領導的優良特點。布爾塞維克主義領導者的職責，是把一切工作都完成到底。

有時日常實踐工作和困難鬥爭時，會被外表形式和大吵大嚷給頂替。讓我們引證這麼一個例子吧！烏里揚諾甫斯克市組織爲了幫助農村，決定在市內企業中給機械拖拉機站裝備五十輛流動修理工廠。這是多麼好的發起呢！但是這一發起被非布爾塞維克的處事態度給降低了價值。直到指定的日期爲止，只裝備了十輛汽車，並且後來查明其中有一半尚未修理。吵吵嚷嚷的愛好者便把這幾輛「汽車」弄到廣場上，召來一大批人，請來了照像師、音樂隊，舉行了檢閱會……過了一些時候，又裝備了二十五輛，又舉行了一次檢閱。「檢閱」的愛好者幾乎喪失了比重的感覺，甚至有個工廠給市內街道的圍柵裝了一些鐵網時，也沒放鬆照像和音樂，請問，這裏還有什麼細心的日常組織工作可談呢！

主動不能容忍表面的積極和堂皇的形式。列寧和斯大林都責備過比任何人吵鬧得更歡的人，同時也責備了把這種吵吵嚷嚷當作動力的幼稚人們。跟着主動性必須有具體的工作，並且能和我們前途上所遇到的艱難作堅韌的搏鬥。

培養幹部具有主動精神，乃是精通馬列理論並在實際行動中能夠有創造性的發揮它的必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工作人員就有變爲區區瑣事事務者的危險。思想鍛鍊不强的人們在工作中會喪失前途和目的。正像斯大林所說：他們「認真的、不停手的搖槳，他們順水穩游，但是他們不僅不知道會被水送到那去，甚至也不願知道。」斯大林同志把這種工作稱爲沒有前途、沒有方向和沒有目的的工作。

馬列主義的科學給予我們確立立場，發展我們的事業的力量，指出前進的方向，對工作的信心，並鍛鍊了奔向勝利的意志。而永世不朽的共產主義意志——正是大膽創舉與主動的湧泉源。

我們的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卓著成就在於他們爲國民經濟、文化和管理機關所有各部門都培養出領導幹部，把他們教育得具有走向勝利的意志、達到目的的頑強性和前進的熱望。我黨所造就的布爾塞維克幹部們，在自己的肩膀上担負過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困苦和愛國大戰的嚴酷考驗。他們光榮的勝任了。戰後和平發展的時期，巨大的新任務又落在我們幹部的肩上。爲了順利地完成這些任務，需要他們發揮「適宜於我們人民的勇氣、主動和智慧。」（斯大林語）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裏。

（烏藍汗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真理報）

論偉大而質樸的人物

編者按：雅可福烈夫是蘇聯由自學而獲致成就的飛機構造家。現任蘇聯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副部長。本文是記述他和斯大林的工作接觸中，所感到的斯大林的優良作風和領導方法。本文是雅氏所著『生平回憶』一書中的一章。

第一次與斯大林同志談話以後，因工作關係，又同他晤談過多次。因此，也就益加使我深刻瞭解這位偉人的一切特點了。

斯大林在他的個人生活方面，一切都是異常儉樸的。他的服裝很樸素：在戰前，通常都是穿着一種特式灰色軍服，其實，也並不是軍服，而是很合身的便裝，褲子也是用這種灰色材料裝成的，皮靴綿軟而輕便。

在他談話的時候，他總是在廳內輕輕踱着步。他聽着對方說話，很少打斷對方的講話，一直讓他講完爲止。

我看見在政府機關會議上，常有人遞給他紙條，而他每次都是把紙條閱完，好好摺起來放在衣袋裏。

他對於每次這種紙條都是很注意的。

斯大林對於浮淺觀察問題的態度是容忍不住的。對於那些在討論一種問題時表現不明問題實質的人，毫不寬恕，定給以鋒利的批評，因此，這樣的人當着他的面永遠也不敢輕易說話了。

認真辦事是斯大林的顯著特點。

我遇見了好幾次這樣談話的情形。比如給某負責人員一種任務時，那人說道：

——斯大林同志，限期太短了，這工作是困難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道：

——我們這裏所談的只是困難事情，正因為事情困難，所以才請您來。您最好說說作這件事情需要甚麼幫助，並將應作的一切都按時完成。

斯大林喜歡人們毫不猶豫的直截了當、確切回答他的問題。常有初次到他那裏去的人，總是不敢馬上回答他的問題，而要極力構思答案，以免陷於窘境。我起初也是這樣，在回答斯大林同志的問題之前，能會窘迫的不是望望窗戶，就是看看天花板。

斯大林同志笑道：

——您看天花板是白看的，那裏甚麼也沒有寫着。您最好照直看，直說你想要說的話。這就是對你的唯一要求。

有時我覺得難於馬上回答他所提的問題——不知斯大林同志是否贊成我的回答，我要說的話是否使他高興。

他看出了這種情形就鄭重說道：

——請你只照你所想的回答就夠了，不要努力說使我高興的話，同我談話不要這樣。如果你要猜想我的心願來講話，那麼我們的談話就很少益處。您不要以為您說的話如果不合我的意思，就會不好，你是專家，我們同你談話不只是使你受到我們的教益，而且也使我們受到你的教益。

斯大林同志在評論一位被解除工作的領導人時說道：

——他有甚麼壞處呢？壞處就是在回答某個問題時，首先是觀察顏色：極力猜度，需要怎樣回答才不致陷於窘境，怎樣說才可以取悅於人，這樣的人會大壞事情，雖然他本心不願作壞事。

有一次斯大林同志說道：

——如果您堅信您自己的意見正確，並且能證明是正確的時候，那您就根本不要顧及任何人的意見，而是要本着您的見解和您的天良去行動。

斯大林不容忍文理不通的現象，當他接到字句不通的文件時，他就氣憤起來。

——真是文理不通的人！但要責備他一下，他馬上就會說他是工農出身，藉以解釋自己文盲的原因，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這是不够文明和粗心大意的原因。特別在國防事業中更不允許拿工農出身來解釋自己的教育程度不足，來解釋自己沒有技術準備、粗魯或不通事理。因為敵人絕不會因我們的社會出身而向我們讓步。正因為我們是工農，我們更應當在一切問題上都有周詳完備的準備，毫不亞於敵人才對。

紅軍軍官中某些人，企圖以個人的勇敢和不怕危險的精神來抵償自己對於工作，特別是對於複雜的戰鬥技術認識上之不足，因此斯大林常說：

——我們有很多人總是誇耀自己的勇氣，可是若不精通戰鬥技術，而只靠胆量是毫無用處的。只有勇敢，只有仇恨敵人，是不够的。誰都知道，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很勇敢的，可是他們用自己的弓箭來反對以槍械武裝起來的白種人是毫無力量的。

在同一小部份當事人解決個別問題時，斯大林總是讓所有的人盡情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有時也徵求某些人的意見，然後才做結論。這時他拿一張紙，一枝鉛筆遞給某人說道：

——請你寫吧。

於是他就親自口授一種文件。

有一次我也在他的口授之下來寫了。我知道他很注意這件事情，所以我緊張起全部腦力，竭力使

文法沒有絲毫錯誤。他一面口授，一面不時的來到我跟前，從我紙上看看寫的怎樣。他忽然站住，看我寫的以後，就握住我執鉛筆的手，點了一個逗點。

還有一次，有一句，我沒有完全造好。斯大林說道：

——爲甚麼把這主詞寫在賓詞後邊呢？您把主詞安置得有點不順當吧！應當這樣才對！——並馬上給改正了。

過了這回事情以後，我又極注意的溫習了一次俄文文法。

——斯大林同志認爲正確通順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是有很大意義的。如果一個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通順、正確的表達出來，那他的思索也就同樣是雜亂無章的，那他怎能辦好所委託的事情呢？

斯大林本人的工作以及其週圍人員的工作都是異常精確的。

有一次斯大林召我去，給了我一個重要任務。我答應執行這個任務。

斯大林說道：

——這件事很緊急，要火速完成，所以我們決定把這件事委託您去作。您需甚麼幫助嗎？

我說道：

——甚麼幫助也不需要，一切需要的東西我都有。

——很好！若是需要甚麼，不要客氣，盡可打電話來要求幫助。

我當下想起一件事情：

——斯大林同志，我有一個請求！不過問題很小，或許不值得煩勞您！

——請說吧。

——在執行這個任務時我常常到各飛機場裏去，可是工廠的交通工具不很好，我需要兩輛「MII」牌汽車。

——只要兩輛汽車，再不要甚麼嗎？

——是的，再不要甚麼，其餘一切我那裏都有。

隨後就放我回去了。

我一直回往工廠去，剛一到工廠的時候，副廠長就迎着說道：

雅可福烈夫同志，方才由汽車工業人民委員部打來電話，叫派人帶着收據去領兩輛「MII」牌汽車。

並要我馬上在收據上簽字。經過四十分鐘，兩輛嶄新的「MII」牌汽車已經開到工廠了。

又過一點點的工夫，莫洛托夫同志的祕書給我打了電話，問我們是否領到了汽車。這原來是檢查執行工作。我因而想到：這真是斯大林同志的工作作風，大家都應該這樣工作才對！

斯大林同志因為担負國家領導工作，需要同許多人接洽，他喜歡新人才，喜歡研究他們，知道他

們的爲人，甚麼人可以担任甚麼工作，以及甚麼人長於甚麼事情。斯大林在談論工作時，往往摻雜着鋒利的諷刺語句。有一次，我因爲一個問題去見斯大林。在談話中，說到一些工作表現不很好的人員時，斯大林竟順便說了這麼一句：

——真是莫斯科河外區的米太雅第和費米斯托克利哩！

他說了以後，就注視着我們，看我們有甚麼反應，是否明白這句笑話，我沒有完全明白，因而問道：

——爲甚麼是莫斯科河外區的？

——您知道誰是米太雅第和費米斯托克利嗎？

——是古代希臘兩個戰略家。

——知道他們有甚麼出色的事情嗎？

——是在某次戰役中的事情，至於詳細情形，我不清楚。

我表現不知道古代希臘歷史，我當時很害羞。還有一次，斯大林在批評某些工作人員時，他把此人與柴霍夫所著『結婚』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相比較。他說完了以後，又猛然問道：

——記得這篇小說嗎？

——不記得，斯大林同志！

——難道您沒有看過柴霍夫的作品嗎！

——我把柴霍夫的作品看過好幾遍，可是我不記得這篇小說。

——有些東西是不應忘記的。

我又害羞起來。我原來覺得自己是個學識淵博的文人哩！

斯大林談論技術問題也好，談論政治問題也好，總是喜歡從歷史中、神話中或古典文學中引證一些合於題目的例子。

他常常很巧妙、很諛諂的引證出謝德林所著『一個城市的歷史』小說中的句子【註】並無情的譏笑那些還多少保持其中主角氣魄的人們。

有一次，需要趕緊試驗一種新飛機。於是就有些『聰明人』要把飛機運到離工廠很遠的地方去試驗，理由是：担任試驗飛機的駕駛員正在那裏。

斯大林道：

——爲什麼要把飛機運到那裏去？駛駕員到這裏來要簡單得多。是誰這樣辦？爲甚麼不想想呢？真是做照『格魯包夫』人的辦法啊！知道他們是怎樣把小牛趕到澡塘房頂上去吃草，把燕麥紛散到謝爾加河裏煮粥嗎？

有一次，在辦公廳商談工作以後，時間已到深夜，斯大林邀請所有出席的人跟他回去吃晚飯：

——今天算够了吧。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我是真餓了。我不專門請任何人，免得大家受拘束，怕麻煩，可是誰若願意跟我去吃晚飯的話，那是很歡迎的！

當然，誰肯拒絕同斯大林共餐？這種邀請是常有的嗎？

大家都一同跟他回住宅去了。當客人到的時候，飯廳桌上已經擺好餐具。斯大林同志的住宅，設備的儉樸、整齊，書籍真是豐富極了，甚至連飯廳的各牆壁跟前也都立着裝滿書籍的書櫥。

晚飯時談話的題目是形形色色的：政治的、國際的、技術的、文學的、藝術的等等不一，這時所有對談的人都是極自由、毫無拘束的說出自己的意見，毫無尊卑與拘束的景象——大家都是平等的。

斯大林常從書中引證，他對某個問題極有興趣的時候，他便走到書櫥跟前，取出所需要的書來。若是談到地理問題時，他就取出他那幅已經折損邊角的舊地圖來，諷道：

——我們來看看我這張地圖吧！這個地圖固然全破了，可是還能應用。

斯大林無論何時的言論，都是充滿着文學引證的。他的記憶力真是罕有的——他從個別著作中摘引長段引證時，差不多一個字也遺漏不了。他特別喜歡高爾基、柴霍夫、謝德林等人的作品。

有一次談到了一種冒險小說，談起了馬因·里德和庫伯爾的著作，斯大林說道，他幼年時很喜歡看這些人的長篇小說。

我小的時候也是醉心於這些書籍，因而向他說道：

——是的，這些書都很有意思，很有用處。可惜，現在不但沒有人著作這類的新書，而且連舊的也不再版了。

斯大林俏然一笑：

——唔，馬因·里德和庫伯爾的作品一個字也沒有關於集體農莊和拖拉機的事情，那我們的出版界怎能再版他們的作品呢！

斯大林待人非常和藹關切，他每次叫人到他那裏去的時候，總是先問：

——您不很忙嗎？

或者問：

——您現在能否不妨礙工作到我這裏來一趟嗎？

——當然可以，斯大林同志！

——那就請趕快來一下。

在初時，當我還沒有當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副部長，我每次從斯大林那裏走的時候，他總是問：

——你有汽車嗎？

這就是說，若沒有汽車，他就打發汽車送我。

斯大林常常以列寧的生活和工作做榜樣，他喜歡回憶他同列寧的各次會面。有一次他講了這樣一

件事情：

在一九一八年時，蘇維埃政府決定從彼得格拉遷到莫斯科來。這時很緊張，在莫斯科剛才把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反革命叛亂鎮壓下去。

——當我們剛一到莫斯科時，——斯大林講道——我們那些與列寧一塊來的人都很擔心他的安全。當我們看見要乘敞汽車走的時候，就請列寧在汽車上坐下，我們圍着他站着，不使他現出來，以免遭到行刺的危險。列寧怎也不肯同意這種辦法，非要我們和他一同坐下不可，可是我們沒有聽他的話，一路都站在汽車上。

誰與斯大林會商工作，誰就是經歷卓絕的訓練。同他每次的談話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在每次會面以後，就會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有很大的進步。

【註】謝得林（一八二六——一八八九）是俄國的偉大諷刺作家。其所著『一個城市的歷史』中有『格魯包夫』人之稱，是他所想像之城市的居民。（『格魯包夫』人是由俄文格魯包一字而來，即愚蠢的意思。）

論工作的求實精神

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以及與達成規定目標的頑強性底結合，這就是布爾塞維克工作作風的基本特性。

俄國工人階級肩負過的世界歷史任務，要求了極大的鬥爭膽略。列寧說過：俄羅斯『需要特別勇敢的，歷史上偉大的，充滿無限熱誠的倡導性與真正革命階級的膽略』。

布爾塞維克黨人所固有的革命膽略，在爲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勝利建設之史年前例的革命鬥爭中，得到了表現，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國家，除開我國而外，都沒有在短期內有過這樣多或者幾乎這麼多的革命經驗，各種運動形式變化的迅速及其多種多樣性。

布爾塞維克黨人過去和現在都永遠賦予革命運動以廣大的革命膽略。「俄國人的革命膽略，是一種興奮力量，它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事物，開展前途，無此則任何運動都不可能前進一步」（斯大林）。

革命的膽略與無根據的空想及馬尼洛夫精神是無絲毫共同之處的。它乃是基於嚴格的科學分析環

境，分析階級力量對比、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水平，以及基於對客觀可能性的估計上面的。黨的實際行動，應將革命的膽略與勝利鬥爭的藝術，以及與組織勝利的才能結合起來。革命的膽略跟求實精神，及與達成目標的頑強性底結合，就形成黨工作底列寧——斯大林作風。

求實精神——這是一種不屈不撓的力量，據斯大林的定義是：它「不知道與不承認感受障礙，它用自己實幹的頑強性來摒除任何障礙，只要事情一經開始，雖然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它就能够貫徹到底，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則重要的建設工作就無意義」。

沒有求實精神，沒有實現偉大創造性任務之頑強的鬥爭，則革命的膽略就可能墜落到革命的詞句，墜落到違背列寧主義精神的革命空談。

理論與實際，諾言與行動，決定與執行底互相結合——這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作風的特性。求實精神不能容忍諾言與行動底分離。表現求實精神——這就是說善於以鬥爭的頑強性，保證本身任務的完成。求實精神不能與實際的組織工作隔開，它乃是組織工作底靈魂。沒有這種工作，則領導會墜落到限於頒發指令，甚至最好的計劃，也不能實現，而依然成爲善良的願望而已。拿契加洛夫州黨委工作的情形看來，它很少關心組織工作，把自己的決議付諸實行。今年三月間召開過的州黨代表會議，就會指出州委會工作中的重要缺點。但正如最後一次全會上所說的，直到現在爲止，州委會仍沒有克服自己工作的缺點，他還沒有根絕形式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而這當然就降低了工作的實際效果。

求實精神是和文贖官僚主義領導方式無絲毫姻緣的，它可以通過許多決議，但不關心組織這些決議的執行。

這招致什麼結果呢，拿這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雅洛斯拉夫州委會關於加緊勞動後備部所屬各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決議。這些決議都正確而且在付諸實現。但這些決議總是不能完成。爲什麼呢？因爲圍繞着這些決議，並沒有做過或者幾乎沒有做過任何實際業務的工作。

不以行動來保證的決議，祇能是美麗的言辭。而這種與進行實際業務工作脫節的言辭，甚且也會把很好的工作者變爲祇能將新鮮事業淹沒在言詞大海裏的空談家。

最好的決議如果不是接着進行組織工作，如果它的重心不是放在保證決議的實行上面，它會成爲紙上談兵和不着實地。黨的領導機關，不僅應當給予工作的方向，指出缺點，並且也善於實際去修正這些缺點，求得工作成績。

用組織來保證規定任務的解決——這就是說首先要接觸人，接觸幹部工作。

任何事情的命運，結果還是由人，幹部，他們的實際工作決定的。因此，接觸幹部，依靠他們，給予他們以實際的幫助，指導他們，——這是組織工作最重要的方面。某些工作人員破壞黨的領導原則，常常以行政方法的一套來代替這些原則，這些事實是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爲黨的工作者忘記了他們並不是行政人員，而是獨立活動的黨組織的領導者，他們有責任展開這種能提高黨員羣

衆積極性之組織工作的方式。

決議通過以後，黨委員會的責任，就是要使最廣大的黨積極份子，共產黨員和勞動羣衆都參加執行這一決議。黨委員會應當使負執行決議使命的工作人員，明白他當前任務的實質，並應當使他們很好地懂得，用什麼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決議，應選取什麼最好的組織形式，才能擴大黨對羣衆的影響力，保證當前任務的解決。

動員廣大的勞動羣衆，組織人員，教育他們——這是黨工作最重要的內容。黨的和政治領導的力量，乃在於領導思想及其計劃，不是爲小部份人所專有，而是爲廣大羣衆所受領。黨的領導者應當成爲人的組織者，成爲工作熱力、倡導性、克服困難時頑強性的鼓舞者。

爲着用組織來保證某一任務之解決，要求善於組織執行決議的檢查。斯大林同志於強調檢查執行的意義時指出：我們百分之百的缺憾和破綻，都是由於缺乏正確提出檢查決議的執行。如果有了這種檢查，則上述缺憾相信是可以預防的。因此，不以此布爾塞維克工作作風的重要要求爲指針的工作人員，是該當受到裁判的。斯大林曾在社會主義工業工作者第一次全蘇代表大會上，會針對這些人說過：「我們有些人往往這樣想道：領導者——這就是紙上簽字，這是可悲的，但是這是事實」。

求實精神底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論事情大小，堅持下去貫徹到底，不在困難面前止步，克服一切困難。布爾塞維克黨人——這是永不向困難投降，而是與困難鬥爭的人。祇有不怕困難，敢於迎接

困難的幹部才是好幹部。在與困難作鬥爭中，可以養成工作者最寶貴的品質——堅忍性與達成目標的頑強性。

沒有頑強性、堅忍性與不屈不撓的精神，則一事無成。祇有有明確的目標，達成目標的勇往精神，與掃除任何障礙的頑強性，才能有所成就。當然，必須力求使工作中少有缺點，少些失敗，但是如果存在時，也『不要因失敗而悲觀失望，而要一次再次的用不屈不撓和堅忍精神來繼續工作』（列寧）。

至於向困難訴苦，很少實際來做克服困難的工作人員是什麼一種人呢？這種工作人員，是很壞的組織者；他不是盡一切力量去克服困難，而是意志薄弱地停在困難面前，使事業中途而廢。

布爾塞維克的求實精神，是與事務主義無絲毫共同點的。後者爲了一些當前的勝利，而忘記了我黨活動的方向、性質和前途。『健全的事務主義——斯大林同志說——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喪失了工作的前途，不將自己工作從黨的路線，那麼它就會變得相反』。

閉塞在狹小經濟事務圈子上，站在黨政策的大問題以外，不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的工作者，是有墜落到政治上的庸人，墜落到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無前途的事務主義者之危險。事務主義者喪失前途，這是不關心理論之實際工作者可悲的命運。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意義在於：它以明確的目標武裝實際工作者，指出達到這一目標的道

路，樹立勝利的信心，鞏固達成目標的意志。不關心理論的實際工作者，是不可能對工作有信心的，是不可能對工作正確性之自覺的。『若果他們不研究列寧主義，如果他們不努力掌握列寧主義，如果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實際工作與必要的理論準備結合的話，他們就會感性地工作，在黑暗中摸索着工作——這就是這種實際工作者可悲的命運。』（斯大林）

列寧會對於政治活動家必須有明確的世界觀，賦予極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向我們幹部提出堅持掌握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問題。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說過，若干工作者當迷惑於其經濟成就時，甚至忘記了地上的一切：政治工作，羣衆的思想教育，國家的國際地位，資本主義的包圍等等。這些人成了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者，喪失了布爾塞維克黨人的風格，感染了自滿自足和百事大吉的精神。

斯大林同志在該二——三月全會上，指出了與此危險鬥爭的道路和方法，號召黨幹部將經濟工作同黨、政工作結合起來。他特別大力提出掌握布爾塞維克主義，關於提高幹部思想、政治鍛鍊、及成爲完全成熟的馬——列主義者的問題。幹部之馬——列主義的鍛鍊，是求實精神變爲事務主義，變爲狹隘的無原則的實際主義之消毒劑。黨的工作者不僅應當成爲好的實際工作者，而且成爲有廣大革命前途，理解週圍事變政治意義的政治家。

爲着順利地實現國家當前的任務，我們的幹部——黨的、非黨的布爾塞維克，蘇維埃政權的和經

濟的工作者，文化活動家——都應當浸透着布維爾塞克的思想，很好地分析黨的政治路線，以國家利益來對待任務，善於在實際活動中以馬——列主義學說為指針。我們幹部的任務是使自己成為在資本主義包圍面前的警覺者，善於辯別和分析敵人宣傳的「釣餌」，同任何在外國事物面前阿諛逢迎的表現作鬥爭，及培養蘇聯人對自己社會主義國家的自豪感。

馬克思——列寧的科學以政治智慧武裝幹部，教導他們要將高度的革命熱情與布爾塞維克建設者頑強的求實精神正確地結合起來。

沒有求實精神——這種列寧——斯大林作風最重要的特質，則任何重要的建設工作都是沒有意義的。黨工作者的職責，就是培養自己具有一切政治領導者所必需的品質，掌握列寧——斯大林的工作作風，這是為共產主義勝利鬥爭中百戰百勝的武器。

（流水譯自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真理報）

與羣衆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布爾塞維克黨的偉大創立者與領袖——列寧和史太林，總極度重視黨與羣衆的連系，總關心這種連系的擴大與鞏固。我們的黨是不能同人民分離的。黨是被許多堅固的不可破裂的鏈鎖同千百萬勞動者連系着，而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戰勝性就在這裏。史太林同志說：「布爾塞維克的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連系。而只要是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人民保持着連系，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的。布爾塞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說明着布爾塞維克是善於組織成百萬的羣衆，善於團結羣衆，與他們打成一片，並使他們跟隨自己。在祖國的戰爭日子裏，「黨同人民是更加親密了，同廣大的勞動羣衆的連系是更加密切了。」（史太林）

布爾塞維克黨在人民羣衆中間享有巨大的愛，無限的威信與信任，因爲勞動人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深信黨的政策之正確，深信布爾塞維克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利益，除了爲勞動人民

的幸福而鬥爭的崇高目的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我們國內，兩種偉大的力量——人民與共產主義已合而為一。蘇維埃社會制度正把蘇維埃人民結合成一個總的集體，創造着一種黨與人民之間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氛圍。

黨會號召勞動者加速恢復與發展工業，於是工人階級就以提前完成工業計劃迎接偉大十月之三十週年的有力競賽來回答這個號召。黨更號召蘇維埃農民為最快的提高農業，為使國內糧食豐裕而鬥爭，於是集體農民對這一號召就回答以為高額收穫的羣衆進軍。

激發羣衆的這種勞動熱情，引導這種熱情去完成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具體任務——黨組織的主要責任就是如此。

布爾塞維克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相不容的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領導——這並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寫作指示。領導——這是說推動廣大階層的人們，帶領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黨所規定的任務。同羣衆、同人民的經常的連系，不僅善於教育羣衆，而且善於向羣衆學習——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爲了正確的領導，只是領導者們的一種經驗是不夠的。這種經驗是不充分的。爲了正確的處理事情，領導者應該以羣衆的經驗，以普通黨員的經驗，以勞動者的經驗來補足自

已。

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三月全會上，斯大林同志曾舉例說明，中央委員會如何珍貴普通人們的經驗，如何注意傾聽他們的建議。在提起全會參加者注意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提高頓巴斯煤的產量的決議後，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它已爲我們全體同志所承認爲正確的而且甚至是著名的決議——是由下層的普通人們給我們提示的。」

黨的領導者——州委的、市委的、區委的、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如果他願意實際地布爾塞維克地指導事情，他就應該經常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同他們拉話，考慮他們大量的實際經驗。

下述事實也說明這一點是有着如何決定性的重要。有一個普通黨員斯太哈諾夫運動者馬特洛索夫，他是「巴黎公社」工廠的切皮工人，他曾提議製訂普及斯太哈諾夫勞動方法的計劃，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工人無例外地完成並超過生產定額。工廠的黨組織支持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莫斯科黨委會通過了關於普及靴匠的經驗到其他工業部門的決議。於是一個在目前普遍全國的、爲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羣衆運動開始了。

這就是爲什麼要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隨時大力支持他們的主動創議的道理。

斯大林同志又教導說，組織決議的執行，乃是正確領導的最重要的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沒

有羣衆的直接幫助是不可能的。組織決議的執行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決議的思想與意義變成勞動者的意識，推動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這個決議，保證一切政策中黨員的先鋒作用，發展羣衆中的組織的與政治的工作，展開競賽與先進經驗的宣傳。沒有羣衆的幫助，連組織決議的檢查，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塞維克黨把自己對羣衆的領導，建立在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布塞爾維克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不相容的。黨始終堅決地與黨員傲慢自大的各種表現、簡單的行政命令、辦公室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鬥爭。在這一點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一個嚴重的警告。決議說：「不能容忍這樣的一些缺點，如像：以行政命令集體農場主席的經常更換，集體農場內部民主的破壞等，來代替集體農場中不屈不撓的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幹部教育。」全會要求黨的一切組織更加鞏固同羣衆的連系。

遺憾的是，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領導者，他們藉自己的職位作威作福，高傲自大、脫離羣衆、不傾聽普通黨員、工人、集體農民們的意見。當然，在這些領導者那裏，事情是不能推向前進的。

什科達同志担任着奧木斯克州卡拉泰斯克區的黨委書記。他一直迷戀於行政命令，以致他不僅脫離了非黨的積極份子，而且也脫離了共產黨員。什科達同志來到集體農場，來到機器托拉機站——他不去同領導者們，同普通的工作人員談論，不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大吵大鬧，而不管事情真相怎樣，

他又到別處去了。這種方法能達到什麼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結果是不僅普通黨員們，就是黨組織的書記，都極力避免到區委書記那裏去。區內黨的政治工作是異常的薄弱，該區的經濟工作在州內也是最落後的。

尾巴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領導者，應該同羣衆有經常的交往與接觸，在其一切活動中憑藉他們。然而布爾塞維克同羣衆的接觸從來不能意味着尾巴主義。相反地，尾巴主義，同行政命令一樣，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有時會有這樣的事：黨組織的領導者表面上似乎同羣衆是有連系的，他常在工人與集體農民中間。可是你一往深處看——就發現這位黨的領導者並不在探究事情的實際，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逃避談論尖銳的問題。

當然，布爾塞維克不需要這樣的「連系」。真正的領導者並不做羣衆的尾巴，而是領導他們跟着自己。他首先忠實於同羣衆的關係。他不害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這問題照黨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工人或者集體農民工作很壞，沒有完成規定，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改正他，率直地同他談話，而如果需要時——就由大家來批評他。這只會帶來益處。領導者的壞的工作，被領導者的壞的工作，都需

要批評。

黨將其同人民連系，建立在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的精神深刻教育羣衆的基礎上。說服的方法，是黨的政治工作中基本的與主要的方法。這就是黨之所以要責成每個黨員進行鼓勵與宣傳，向羣衆解釋黨的政策與決定之意義。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指示：『區的、州的、邊疆的和共和國的黨與蘇維埃的機關負責領導的工作人員，必須到集體農場中去，親自指導政治的與黨組織的工作，指導集體農場的座談會與會議，在黨的基層組織中解決黨的與政治的工作。』

可是，並不是各地都在執行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在布列安斯克州，許多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逃避做集體農場的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還算是講演團中的人，可是，他們就連自己這個責任也不去盡，州蘇維埃執委會副主席格列賓尼可夫同志終年不在集體農場做一次報告。

四月和五月間他是在齊里亞廷斯克與維葛尼奇斯克區，但是他沒有一次向集體農民講話。他說：『沒有時間做報告，應該播種了。』

黨的、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應該利用一切同勞動者連系的形式。在這裏親自與人們接觸，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種接觸常能很好地使人說出口裏話，無誤地確定羣衆的情緒，立即解答羣衆的詢問，並在政治上教育他。那些極力避開勞動者的有官僚習氣的領導者，是值得最尖銳的遣責的。而另一些工場的管理人或蘇維埃組織的領導者，普通的人簡直難以會見他們。不能容忍類似這類非布爾塞維克

的實際。

同羣衆連系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

黨的組織，應該儘可能地好好利用羣衆組織的機關——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等等，以鞏固同羣衆的連系，以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企圖僅僅依靠黨組織的力量，黨員的力量來做一切，而不吸引非黨的積極份子參加工作的那種黨的領導者，是不好的。布爾塞維克領導的藝術在於在勞動者的一切羣衆組織的活動中，組織配合行動與連系，領導他們，去完成這些或那些任務。

黨的組織應該經常關心改善地方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必須用一切方法鞏固它們，以對選民、對人民、對廣大勞動羣衆負責的精神教育它們的工作人員。

同羣衆連系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它使黨能夠每日每時地去同羣衆談話，把黨的思想與政策變爲成百萬羣衆的財產。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之責任，就是積極地參加報紙工作。可惜很多地方工作人員很少這樣做。

同人民密切的經常的連系，善於不僅教育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善於領導羣衆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黨的領導者之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如此，正確的布爾塞維克之領導的條件，就是如此。每一個

黨組織的，黨委員會的領導者，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嚴格地遵守這個列寧、斯大林的指示，做羣衆的
真正領袖。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裏。

（齊生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真理報）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爲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鬥爭，指示出我們有着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絕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我們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鬥爭裏，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地結束了社會發展的盲目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地揭發，掃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地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的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該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嗎？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

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地更嚴肅地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地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地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地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裏，廣泛地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着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關的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羣衆，參加到發現和改正缺點的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意見的講台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地對待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地掃除缺點；有真正布爾塞維克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是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作鬥爭中來用布爾塞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的，舊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批評的看法，認為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是建築於欺騙和壓迫之上的，他們駭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缺點穩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蓋子來把它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的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麼，資產階級制度就是分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的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類慫恿互相撕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爲目的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偉大辦法，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批評，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帶來極大的益處，因爲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果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麼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爲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爲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

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本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把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裏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裏。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在討論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個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作爲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作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給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公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份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

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份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委所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理會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就要企圖以愚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罰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夠依靠黨的羣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夠回答羣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常有的，並且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的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絞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是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譁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把他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

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積極性去實現批評的正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痺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或是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為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的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羣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裏潛在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啓發羣衆的主動性，幫助充分利用蘇維埃制度的可能性，並能堅決揭發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所直接帶給我們事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能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績。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的許許多多

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羣衆不僅僅積極參加決定問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份子會，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者自我批評最好的舞台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的消滅討論問題中的鋪張、八股、老一套的因素，妨礙真正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會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彙報會的性質，發言的目的不是幫助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解決缺點，而是報告他們所做的工作，引證出很多統計材料。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題，是否將就個別人的自尊心，是把批評僅僅針對着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以揭發缺點的真正原因爲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是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發其根源，以便策劃改良事業的方法爲目的，這就要求較大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能於傾聽所有的寶貴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並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解釋這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尾巴主義的奉承阿諛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需要的不是所有其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

評。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和原則性，就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題上可以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爲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分體現出來，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了嚴重的損失的時候；可惜得很，當錯誤還在胚胎中的時候，還在僅僅揭發壞根就可以結束它的時候，我們却很少展開批評和揭發錯誤；由於我們揭發缺點的不及時，我們已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雖然有些並不需要費大的力量就可以迅速糾正的事，我們却常是忽略這個萌芽而認爲它是不重要的，要是工作人員的毛病隨着時間發展起來，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嚴重的辦法，甚至發展至撤職等等。各種工作的缺陷，任何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經常都在逐漸發展着；領導者如果認爲是突然發生的，那僅僅是由領導者自己對工作沒有批評的態度，忽視了預告的信號。事實說明了有時不得不撤換幹部的事，譬如說如果一個區委書記要是很久以前已對他有過批評和指責，已及時注意幫助了他，那麼事情就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使我們不能夠挽救這個幹部。常有這樣的事，批評僅僅是針對着聲名不好的工作人員，而把公認爲好的置諸批評圈外，停止了指明缺點，沒有分寸地恭維他，這種辦法是會害了一個有出息的工作人員的辦法。

布爾塞維克黨是以他的不抹煞工作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堅決澈底地揭發他們，幫助他們糾正來保

證對幹部的教育和培養的，是以幹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幹部的；黨僅僅是以事業的利益來作爲它行動的方針，它照顧的僅僅是事業的利益，而照顧的不是幹部的自尊心和情緒，我們要求各經濟、思想部門中的幹部，對待批評要有原則，要客觀。

一切片面性都會給我們事業帶來損失，這是個很大的教訓。在評法捷耶夫著名小說「青年近衛軍」之文藝批評的錯誤問題上，就是一例。大家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分析了這本小說的不可抹煞的優點，忽略了對這樣小說的嚴重的缺點的批評，爲了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及作家本身的提高，應當指出在這本小說中，沒有表示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把布爾塞維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加以歪曲以及犯了其他帶有原則性的錯誤。

當着我們對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還沒有客觀地檢查時，而來全盤地吹噓恭維，或是全盤的非議，就會妨礙實際糾正缺點和阻礙了幹部的發展。此外，這種態度對那個政治上不成熟而有了一點點成就的人，最容易使他們發生昂首天外，自高自滿，百事大吉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例如黨的組織在執行聯共中央二月會議的決議時，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後恢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得到了重大的成績；當然這決不是說所有的農村黨的工作缺點已經克服了，爲了真正的提高羣衆集體農村的水平，爲了在普及過去一年經驗的基礎上，澈底揭發過去所有的缺點和漏洞，還有很多的事要繼續去做；可是由於黨的工作者在改進自己的工作上了第一次以後，就把批評置諸腦後，而代之以鋪張讚頌，通常隨之而

來的有高枕無憂和天下太平的觀念。

在本雜誌上已公佈過莫爾多太黨組織的錯誤，他們把總結一年農村經濟的省委擴大會稱之爲「勝利者的大會」，因此就把問題的討論變成某種互相發表吹噓恭維的檢閱。比這更不體面的事，是聯共黨略已爲金斯科省委書記完成了徵糧工作以後，所收到的雪片飛來的賀電和祝辭，以及他本人對區委和集體農莊的謝電登滿了地方報紙的篇幅。

真正的布爾塞維克，任何時候也不會高枕無憂於自己既得的成績之上，他們很好地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滿足於自己的勝利，就是我們運動前進的終點；爲了使這種情形不致發生，我們需要自我批評。』我們的成功越大，我們所創造的勝利前提就越高，那麼，就要更高地要求我們的幹部，勝利和成功不僅不能忽視我們的缺點，相反的，應當更堅決地幫助揭發缺點；只有這種態度，能够保證我們的經濟、文化建設在各部門中不斷的前進。擺在我們國家面前的任務，要求提高領導幹部的水準，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對那些妨礙掘發我們可能性和準備力量的事情不展開批評，那麼，就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不在思想戰線上開展原則的客觀的批評，就不能克服在蘇維埃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只有勇敢的自我批評能够使幹部提高，能够勝利地解決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的組織的重大責任，就是不斷的在自我批評精神中培養幹部。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效率和遠見——

布爾塞維克的效率，乃是一個政治領導者的黨的工作人員所必要與應有的品質。沒有這種品質是不可想像的。

效率，乃領導者必要與應有的品質

效率應理解爲：在實際上能够實施黨的決定，及時採取實現黨的路線的辦法。一個講究效率的組織者，應有在一定情況中指示方針的能力，應正確和不耽擱地解決問題，及時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執行國家的計劃、任務、指令。這是以工作人員的經驗、知識與政治敏感來達成的。

列甯曾經說過：黨的組織與黨的領導者的意義，在於「爲了迅速與正確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就要培養必需的知識，必需的經驗，以及除了知識和經驗以外的必需的政治敏感。」不言而喻，有效

率地、迅速地、不耽擱地解決問題，與急躁和草率沒有任何共同之點。這種急躁，常常引到放棄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的問題，代替以次要的、偶然發生的問題，而嚴肅的組織工作代替以空洞的例行公事。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的幹部，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的時候，在全面地判定方向和全面地估計一切長短的時候，應當英明和不急躁。」

布爾塞維克的效率就是才幹。斯大林同志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清楚地替清談家的工作者，替老實與忠誠地對待蘇維埃政權，但沒有能力領導，沒有能力組織什麼的人，畫了一個像。斯大林同志論這些清談家說：「他們動員起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他們有轉變，有進步，然而事情原封不動。」斯大林同志當時要求把那些可以讓任何活生生的事情沉溺在滔滔不絕的演說裏的不可救藥的清談家，從領導位置上撤職。斯大林同志說過：「在講效率的工作中，沒有清談家的位置」。

我們也有在講效率的工作中之另一種類型的不可靠領導者。這就是不敢解決任何問題的領導者。他喜歡在與急躁作鬥爭的形式底下來拖延事情，喜歡在集體領導的形式底下開會。爲了避免解決問題，他總是裝着「想一想」，「商量商量」的樣子，然而過後他自己既不想也不同別人商量。在州黨委的實際工作中有這樣的情形：爲了糾正已發現的缺點，要採取有效的辦法，但是把問題推給黨委會議，並且也沒有準備考慮問題。這種「領導」通常引起遲延、緩慢、有時還引起缺陷。

工作中同效率要求：確實的計劃，人力的正當分配，對執行情形的檢查，同被領導者的密切聯

系。如果沒有製定能够估計到主力軍與後備軍的適當計劃，沒有建立各種武器之間的互相配合，沒有規定精確的期限，沒有委任負責人，沒有對執行之周密之不斷的檢查；那麼有成就地進行軍事行動是不可想像的。同樣的，如果沒有計劃，沒有檢查，任何經濟活動和經濟工作中的成就，都是不可想像的。在戰爭中情況變化的場合，如果指揮上不見得靈活，對計劃不加以適當的修正，那麼部隊會遭受失敗。在經濟工作中的情形，也是這樣。這裏也要求同樣的靈活性、創造性和真正的效率。

不言而喻，不僅在經濟領導的問題上，而且在黨內工作中，也要求效率。黨的機構的一切工作者，應賦有效率、敏捷、能動性。必須不拖延、不停滯地解決發生在黨委面前的問題。及時接受意見，迅速吸收共產黨員的創議，善於指導他們的活動，及時糾正工作人員——這一切是政治領導者必須的義務。

講效率的具體方法

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在聽取依瓦諾夫州黨委工作報告後，曾經通過了決定，建議在黨的州委、區委與市委，蘇維埃與經濟的機關的實際領導中，提倡講效率的工作方法。中央委員會把這個任務具體化了。什麼是講效率的方法？這就是：

及時解決問題。

不花費時間在不必要的會議上。

對通過了的決定之執行，施行嚴肅的組織工作。

分配負責執行具體的委托和任務的工作人員。

依靠真正了解確切情況者來研究問題。

及時揭露與糾正黨與蘇維埃組織中工作的缺點。

對黨與政府的決定與指令的執行，進行日常的檢查。

在進行農業運動時，對黨的工作者要求高度的效率。春季播種、照顧播種、穀物收割、穀物供應、秋季播種——這一切工作都帶有季節性質。在這裏如果缺乏效率、遲延，可以破壞全部事情。對黨的領導者，不僅要求為實行工作而定出好計劃，而且還要在情況中指示方針，在運動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作迅速的決定，熟悉當地特殊性，看到現存的困難，並採取辦法克服困難。

現在地方黨的領導者，正埋頭於完成春季的播種工作。這裏有許多迫切的、完全必須的、不可耽擱的大小事情。播種之最迅速的完成，依靠於效率，實際辦法之及時採用，執行情形之日常與時刻檢查，對發現的缺點之立刻反應。這裏黨的工作者要不惜時間和精力。

同時，正是現在而不是再晚些，應當最緊張地展開收割的準備工作。正如在冬天，就應當關心春季播種——修理拖拉機，選擇幹部等等，與進行播種同時，就應當準備收割——修理聯合收割機、農

具、乾燥器、倉庫等等。

但是如果認爲領導農業可以僅限於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僅限於播種和收割，那就錯了。黨的工作者應當看得更遠，深刻地看透經濟的規律，要熟悉集體農場的經驗狀況。分析材料，不要限於平均數字，而且要歸納其有機的組成部份。要會把今年的總結與去年的，許多年的總結來比較。這樣就可以看出發展的動力和趨勢，就可以看出長短。黨的領導者可以及時干預，糾正事情，防止落後。

對於有些黨的與經濟的工作者。我們說他們是講效率的人，是『消除缺陷的專家』。當然，排除缺陷是很大的藝術。可是做到沒有缺陷，及時預防缺陷，那是更大的藝術。

要領導，還應有遠見對新鮮事物具有敏感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不僅要求及時準備當前的運動，而且善於看得更遠。應記得斯大林同志的話：「掌舵時要看。如果什麼也看不見，等到情況使我們遭了殃，那麼這並不是領導。布爾塞維克主義不是這樣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有遠見。」

我們的幹部忙碌於完成城鄉經濟計劃的龐大的、當前的、有效率的工作。這個工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只有脫離生活的人們才會蔑視它。然而同時如果完全埋頭於所謂『當前的工作』中，不理會作過的工作，不考慮工作的前途，那麼這是不可救藥的罪惡。生活不是按照一個標準前進的，日新月

異，情況變化着，新的問題發生着，對新穎事物具有敏感的黨的工作者，應從此中作出適當的結論。時常我們的工作人員陷於日常的當前的事務中，陷到這樣程度，就是自己失掉了思考前途的可能性，失掉了線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烏拉基米爾、伊里奇論建立蘇維埃領導機關的工作的一封信上會寫道：『使自己擺脫雜亂無章，這種雜亂無章會葬送我們大家，要保證自己安靜地全面思考工作的可能性。』我們黨與經濟工作者要記住列甯的這些話，這多麼重要。

完全忙碌於當前工作的人，正是因為沒有從全面去思考工作，而意外地面臨着嚴重的缺陷。這種工作者時常滿足於局部的成績，一天的成績，一個運動的成績，而無視於在整個方面正在醞釀的落後。

例如，烏克蘭一些州的一些黨的工作者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為運動而運動的、表面地、不分析經濟地、不注意經濟發展趨勢地領導農業。一般說來，農業運動進行得並不壞，彷彿是完成了計劃。然而在烏克蘭像春麥這種重要的農作物的播種，一年一年減縮了。例如在波爾塔瓦州，春麥播種一九三七年為十三萬五千公頃，一九三八年為十萬八千五百公頃，一九三九年為九萬九千公頃，一九四〇年為九萬一千公頃。在戰後，一九四六年春麥播種大大落後於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波爾塔瓦州黨的領導者沒有分析農業經濟，沒有及時發現減縮春麥播種的有害傾向。其他的烏克蘭的工作者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斯大林同志，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二月擴大會議，已指出了這一點。

遠見的藝術，也是工業領域中黨的工作者的寶貴品質，一些工業中黨的與經濟的領導者不去看明天，不關心明天，滿足於已得的，因而失掉批判地估價經濟成就的能力，雖然這些成就有時是不鞏固的。例如，有些煤礦工業的工作者的特點就是如此。大家知道，採煤的成就是由於準備工作的及時進行來決定的。有時有這樣的情形，煤礦在幾個月期間，甚至一年之內，很好完成計劃，然後『意外地』破壞了計劃，而開採量的下降，檢查時發現了。當進行煤的開採時，經濟領導者與黨的組織不關心準備工作的進行，不看一看煤礦的明天。

這不僅指個別的煤礦，而且同樣指整個煤礦區。拿庫茲巴斯爲例吧，這裏煤的開採曾經迅速增長，而在最近速度的增長猛降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庫茲巴斯是後起的區域，是在上面的礦層採煤的。爲了這個目的，規定了採礦的適當方法。然而情況變了。上面的礦層已不能供給我們所要求的煤的數量。需要轉向下面的，更深的礦層去。爲了這個目的，先前舊的採礦方法往往不能復用，需要以適合於煤礦的新條件的新方法來補充它。然而庫茲巴斯黨中組織與經濟領導者沒有預先考慮、研究和實驗這種方法。現在不得不匆匆忙忙進行這個工作。雖然現在地方組織有可能表現出應有的效率，但由於缺乏遠見而受的損失是很明顯的。

阿罕格爾州的木材工業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阿罕格爾的州黨委第一書記尼古拉也夫同志和州黨委，沒有注意本州主要的經濟部門木材工業的事務，他們很少到木材工業場和木材站去，同工作人員

幾乎沒有什麼聯系，並且不清楚木材供給準備的真實情況。脫離了木材工業場的州黨委，沒有去解決阿罕格爾州木材工業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問題：提高機械化、培養固定的工人幹部、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沒有揭發木材工業部工作的嚴重缺點。

爲了完成當前計劃的鬥爭，應與解決前途問題，與預防缺陷、不均、落後配合起來。如果黨的領導者不向前看，那麼領導的效率便失掉價值。

（伊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真理報）

共產黨員的思想教育

是黨的組織的重要任務

蘇聯武裝部隊中不久黨的領導機關即將開始總結工作和進行選舉。在準備和進行黨的總結報告及選舉會議和代表會議的進程中，陸海軍的共產黨員們必須首先集中其注意力於未曾解決的問題上，要波爾塞維克式地揭發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妨礙着我們按照聯共（布）黨中央的要求，改造全盤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進一步鞏固黨的組織，在軍隊的訓練和教育中，在各部隊、艦船及各兵團整個的生活中極力提高各級黨的組織作用，乃是這一改造的最重要的條件。

然而，黨的組織的鞏固程度，對其羣衆影響的大小，從來不是由聯共（布）黨的黨員和候補黨員

在組織中的數量來確定的。斯大林同志指示說：「……黨的，特別是共產黨的力量和比重，與其說是依靠黨的數量，不如說是依靠其質量。」不顧質量，祇求數量的作法，在我黨內是從未提倡過。黨的組織質量的改善，黨員覺悟水準的提高，是蘇聯武裝部隊底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之重要和基本的任務。

可惜得很，關於這一布爾塞維克的法則，最近以來，在某些地方開始被忘記了，武裝部隊中某些黨的工作人員，爲了追求黨的組織數量的發展，走上了成批的、大量的吸收黨員之不正確的、有害的道路。

個別黨的組織大開門戶，把凡是遞了申請書的人都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了，他們企圖在吸收黨員的數量上『出人頭地』，這種傾向是不健康的。例如在東西伯利亞軍區，從一九四七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黨的基層組織，將交申請書人的總數百分之九十八·六均吸收入黨。並且從六月至十月，沒有拒絕一個願意入黨的人。在十一月裏祇有一份申請書沒有被批准。這一事實證明東西伯利亞軍區許多黨的組織，不經任何的審查，吸收了所有交了入黨申請書的人。這個軍區的黨委甚至也未採取各種必要的措施，來糾正黨的基層組織嚴重違犯黨章的情形。對吸收黨員抱着這種不加分別大批吸收的態度下，經過黨委機關審查而未批准的，從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僅佔百分之七·二。

還有這樣的兵團，其中不僅黨的基層組織，甚至黨委基本上是不拒絕吸收任何人入黨。這種事情

的生產，完全不是因爲在這裏他們已清清楚楚地了解了所有要求入黨的人，認爲他們都具有參加我黨隊伍的條件，在工作中考察了他們；不是的，在此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裏只是力求無論如何要強行增加黨的隊伍的數量。這種吸收黨員的態度，與我黨黨章之要求嚴格的個別吸收的原則，是沒有絲毫共同之點的。

這一系列的有害的偏向——大量的吸收入黨這一傾向——是直接從政治機關發端的，如果仔細一些的去了解政治機關底個別的書面文件，就會發現其中某些機關，不僅沒有以對黨的隊伍之純潔性的高度負責精神，去教育黨的下級，黨的工作人員，而相反的慫恿他們去強行發展黨的組織。經常在這些出自高級政治工作人員手筆的文件中，可以遇到這種簡單的，但非常明瞭的句子：『在發展黨的隊伍方面，還沒有作到真正的開展。』

克洛托夫上校所領導的政治部底活動，在這方面表現得更其明顯（克上校爲該政治部代理主任）。在聯共（布）黨中央有名的決定之後的一年內，黨員則增加了二倍半以上，政治部把它列爲了自己的成績之一，而且，認爲這一發展是不夠的，因此，採取了各種措施，以便更廣泛的展開這一工作；這方面又有了成績，結果黨員幾乎增加了三倍，僅在一九四七年的十個月內，所吸收的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的人數，比聯共（布）中央決定後的一整年內所吸收的人數，幾乎增加了兩倍。這裏常常是不加討論的作出關於吸收黨員的決定。在黨的會議上審查申請書時，照例祇有二、三個人發言。

政治部繼續要求黨的組織更加積極的進行吸收黨員的工作，加強的發展黨的隊伍。

某些軍區報紙所持的態度也不正確。報紙的篇幅充滿着這樣的標題：「培養優秀份子入黨」、「積極挑選介紹入黨」、「戰士別特洛夫被吸收入黨了」等等之類。無疑問的，他們就這樣來鞭策黨的組織，催促它們在數量上去發展。有時我們軍區的刊物竟為那些要準備入黨的人大吹大擂，這樣一來，在這件事情的周圍造成一片喧嚷，並先以自己的意志強行加諸黨的組織。這是毫不奇怪的，類似這些行動發生之後，在某些黨的組織中，便編造「發展對象」的名單，把這位或那位同志「召募」入黨，這便或為許多共產黨員的直接任務了。

在基輔軍區，例如某團的總支甚至編製了專門的計劃日曆表，該表預定「阿布拉敏哥同志在一定期限內培養團的管理排中兩個少共團員入黨，辛涅列夫培養第一砲兵中隊的三個人入黨」等等；在某個步兵營裏也有這種類似的計劃。依照這一計劃，各連黨的支部書記編造了十八人的名單。其中也包括有蘇包達下士，他曾因違反紀律剛剛受到嚴厲的處罰，因對工作抱冷淡態度，受到少共組織的責備，軍事教育上得分很少，不讀報紙，不參加分隊的社會政治生活。

類似這樣的幹法，祇能有害於黨的事業還不明顯嗎？

同時不能不指出，在不少的黨的組織中，對於候補黨員的不正確的觀點是相當廣泛的散佈着。有一些黨的領導者認為，既然候補黨員過了按黨章所規定的候補期，則他一定應當「轉」為聯共（布）

黨的黨員，不考慮候補期間的表現，機械的將候補黨員「轉」爲黨員，是完全不許可的。本就應該從我們的辭典中，拋棄「候補黨員轉爲黨員」這句話；在我們的黨章內是沒有這樣的話的，黨章裏沒有說「轉」的問題，而是說將候補黨員吸收爲黨員，並且要強調指出「吸收黨員只有個別的進行」。黨章絕沒有要我們把所有候補期已滿的人都一齊吸收爲黨員。相反的，黨章明顯的講到，從已滿了規定候補期的候補黨員中，「吸收那些覺悟的，積極的和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爲黨員」。

蘇聯武裝部隊的黨的組織，在最近幾年來新的成份大大的增加了。在偉大祖國戰爭期間和戰後這一時期內，加入聯共（布）黨的人數，在這些組織中佔五分之四。這些人還未經過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嚴格鍛鍊。其中有很多還未十分牢靠的領會黨的紀律原則，黨的傳統。因此，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政治教育水平和黨的組織數量上的發展之間，造成了顯明的不一致。如果黨的組織進一步在數量上擴大，不僅不能加強，而相反的會削弱其布爾塞維克的戰鬥力。

因此，正如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在波蘭召開的九國共產黨代表的會議上，在馬林科夫同志關於聯共（布）黨的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的一樣：必須把全部精力放在：「不是強要進一步發展自己的隊伍，而是展開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政治教育，把重點放在提高共產黨員的政治水平上，因爲，歸根到底，質量重於數量。」因此可見，政治機關和黨的組織應該將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共產黨員的思想教育及其布

爾塞維克的鍛鍊之基本改善上。

不言而喻地，黨員之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是爲提高而提高，而是一種手段，藉助於這一手段，黨的組織才能更加提高黨員和候補黨員的積極性，才能達到加強他們在軍事和政治準備上的先鋒作用。在黨的總結工作及選舉會議、黨的代表會議上，應在這一角度下去討論黨的教育問題。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聯共（布）黨中央有名的決定之後，一些政治機關對黨的教育工作，獲得了某些改善。黨的組織開始更多的注意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的馬列主義學習了。然而，在共產黨員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還未發生真正的轉變。

許多黨的組織，尙未擺脫早就是被宣告爲有害的干涉黨員自修理論的政策。從事自修的共產黨員，常常是完全隨自己的便。對他們的學習，沒有應有的監督，他們沒有得到認真切實的幫助。

黨的教育其他方式也攪得不好。在黨員的政治教育這樣重要的事情上，還未完全消除「十日曝之一日寒之」的現象，是全然不能允許的。在去年所建立的大量的聯共（布）黨史研究小組和青年黨員的政治訓練班，在夏秋兩季，停止學習了。例如，在列寧格勒軍區有一半以上的政治訓練班實際上已垮台了，而其餘的大部份現在還只在研究教育計劃的頭幾節。在裏海艦隊的二十個小組中，或多或少正常的祇有一個組。基輔軍區的各小組和訓練班，也呈現着同樣的情況。

在共產黨員之布爾塞維克黨性的教育上，在擴大其政治眼光上，黨的會議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我們這裡所指的會議，是指的作爲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學校的會議。但是，祇有當具備高度的思想水平，很好的準備過的會議，才可以是這樣的學校。而在很多場合下，恰好就缺少這樣一點。在部隊中黨的會議，經常是沒有周密的準備，匆匆忙忙地進行的。提到會上的問題，常常不是深思熟慮過的。在基輔軍區某些兵團中，到現在還存在着這一條規則，基層組織的黨的會議之議事日程，只由上面，由政治部規定。這就縮小了共產黨員的主動性，阻礙了他們的創造性。在這些會議上積極性不高，這並非偶然的事。大家結果僅是聽聽二、三個「文職」的演說家的報告和發言而已，基本黨員羣衆沒有感覺自己是這些會議上的真正的主人翁。

實際參加日常的生活，對每個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政治上提高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在這一方面也還是攪得不好，黨的委託經常流於形式。往往不去考慮黨員的願望、及興趣或能否完成這種或那種黨的工作的素養，就給他們黨的這些委託。在基輔軍區一個黨的組織中，例如一九四五年的聯共黨員——班長阿赫麥托夫，黨委託他同青年黨員們談談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隨後再同他們研究列寧的『四月提綱』。可是阿赫麥托夫自己也不了解聯共（布）黨史，此外，他的俄文也十分糟糕。

爲了教育共產黨員，給他們培養在非黨員羣衆中的政治威信，黨的領導者必須很好的了解自己黨組織中的黨員，了解每個黨員的優點和缺點，善於及時的扶植他，引導他，幫助他一天天的前進。

當前黨的總結工作及選舉會議和黨的代表會，其所負的使命便是動員政治機關和黨的組織，來解決主要的任務——改善共產黨員的思想教育。這一任務的完成，是軍隊中整個黨政工作新高潮的最可靠的保證，是加強黨員和候補黨員在學習和紀律中的先鋒作用，勝利實現蘇聯武裝部長的要求的最重要的條件。

（付克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六日紅星報）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

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正確的政策是勝利的源泉，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這並不等於勝利的本身。勝利不是自己會來的，必須加以組織，加以爭取。

斯大林同志對於政策路線與組織工作的相互關係，作出了典型的定義。他說：『在製定正確的路線之後，對問題已作出正確的決議之後，事情的成敗即決定於組織工作、人員的正確選擇以及對各個領導機關執行程度的檢查。否則，黨的正确路線與決議即會遭受嚴重的損害。不僅如此，在製定正確的政策路線之後，組織工作即將決定一切，就是政策路線本身的命運——成功或失敗——亦不例外。』

布爾塞維克政策之所以能獲得連續的勝利，是因為黨經常以全部力量進行組織工作，以保證自己政策路線之實現。我們的黨正在進行着艱巨的工作——動員廣大人民羣衆完成共產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

列甯與斯大林教導我們：在組織工作中最主要的是選擇幹部與檢查執行程度，黨的組織只要遵循這一指示，就可以使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方法在我國偉大建設的各方面都獲得進益。

目前所進行的黨的代表會議指出：黨的組織爲了提高戰後時期的經濟與文化，正在進行着熱烈的與全面的工作，發揮蘇維埃人民的偉大力量，他們的積極性與克服困難的堅定精神。黨的組織在全國人民中發起社會主義競賽，爭取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在聯共黨中央對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決議頒佈後，各地組織即更加注意於思想教育的工作。許多黨組織都積累了對羣衆宣傳鼓動的豐富的經驗。黨的幹部強固的掌握着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

但是，許多次的代表會議也指出了黨組織在領導工作方法上存在的嚴重的缺點。仍然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只注意於開會，準備決議與製成決議。而在決議一經製成之後，他們往往就會把這些決議忘得一乾二淨。製成的決議在實踐中會怎樣？所能實現的程度如何？是否所有的機構都已行動起來？遇到何種困難？需要採取何種補充措施以保證事情的順利進行——對於所有這些都不給以應有的注意。例如，乞卡洛夫州的黨代表會議指出：州黨委與某些區黨委減弱了對自己決議的執行程度的檢查。州黨委與區黨委對於決議的執行只倚靠着自己小團體的活動，未能發動黨的幹部與蘇維埃幹部以及廣大勞動羣衆積極參加工作。在萬不得已時方派遣全權代表的辦法，在這裡已成爲領導上的主要手段。日常的細密的羣衆工作、對幹部的指導等時常是被無數決議的傳達與電報的拍發取而代之。

這樣的領導方法會造成一種錯覺，即是：黨委會如能製成大量的決議，向各地發出許多電報，就似乎能表明它在工作中確實有足够的緊張。但實際上，黨的機關正是因為忙於這些工作而使自己不能廣泛並全面的推動事情的進程。這樣，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現有的提高全部工作的可能性。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原則要求：在製成決議之後即須計劃並製定方策以保證這一決議的執行。在某種情形下，需要派出一個或一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至該地去。在另種情形下。則必需給以物資技術器材的援助。總而言之，組織決議的執行，這就是說要發動黨與蘇維埃的無數幹部積極工作，由他們領導廣大人民克服困難，保證以布爾塞維克的工作速度完成國家當前的任務。與幹部們一起工作，給他們實際的幫助，指導他們，這是檢查的主要方面。黨委會的責任在於使工作人員們明白他們所執行的任務的實質，使他們了解用以更好的執行決議，最好是選擇何種組織形式方能增加黨發動羣衆的力量，保證黨組織當前任務的解決。

檢查執行程度是黨組織手段中最有力的武器。但必須嚴格遵守下述數點：

第一、對執行程度的檢查必須是有系統的，而不是插曲式的。就是說，在製成決議之後，不遲疑、不等待、立即督促決議的執行。了解該組織的日常生活，惟有如此，它才能隨時隨地過問並在必要時糾正工作。這樣，對執行程度的檢查方能隨時發現工作中某一段落的混亂並及時找出造成混亂的責任者。只有隨時並有系統的檢查執行程度，方能預防錯誤和缺點；也只有如此，黨委會方能適時的

幫助自己的地方組織，檢查執行程度仍是黨組織以布爾塞維克責任心與紀律性教育幹部的有力武器。

第二、檢查執行程度不應該由次要的工作人員負責，而應該由領導人親自動手。列甯要求各組織、各機關的領導人必須將自己領導下的有經驗的、得力的工作人員『控制在自己手內，用以檢查實際工作之進行』，委託『某某人，到那裏去，視察，檢查，如果事情出漏洞時要你負責』。斯大林同志曾指示過：領導人親自檢查工作是能够使工作檢查發生效力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第三、檢查執行程度應該不只是根據形式的報告，而首先應該在工作地點，根據工作的實際效果檢查之。

第四、檢查執行程度必須是客觀的、嚴格的。惟有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方能及時揭露缺點並製定糾正缺點的方法，檢查執行程度時對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能舞弊徇私。那裏發展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風氣，那裏就會產生不負責任的情形，跟蹤而來的就是對國家利益的漠不關心與不忠實。對着缺點應該不是掩飾，要展開尖銳的布爾塞維克的批評，不是寬容，要用非常嚴格的態度對待它——這是使檢查執行程度收效的一個重要條件。

檢查執行是布爾塞維克和領導的基本方法。廣大勞動羣衆參加工作的能力。如果要加強對工作的督促與檢查，就必須改進全部的領導工作方法。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工作的檢查如能組織良好，就會像探照燈似的，隨時隨地照明一個部門

的工作情況，使官僚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暴露自己的原形。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工作中十分之九的缺陷與漏洞都是由於缺乏組織良好的工作檢查而來。無疑問的，如果是正確的工作檢查，工作中的缺陷和漏洞大都可以避免的。」

黨組織的責任是對於決議執行程度的检查工作加以積極的改進。而決議的本身則應確實符合蘇維埃人民爲執行其所担負的偉大任務的要求。這就是我國經濟、文化生活與共產主義事業建設各方面的新的勝利的前提。

（常彥卿譯自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蘇聯真理報）

掌握布爾塞維克領導經濟的方法

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大大的提高了恢復和發展工業與農業的速度。

共和國的工業完成了一九四七年工業品總產量的百分之一百零二。許多新的大企業亦業已開工。各城市在一年中恢復和建築了二十三萬二千平方米面積的住宅。

爲了執行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共和國的集體農莊莊員及農民田莊在一九四七年擴大了春季播種穀物百分之十八點二，和冬季穀物播種（將於今年收割者）百分之二十二點一。拖拉機供給站超過了拖拉機工作的計劃。共和國提前完成了國家的徵糧計劃，給國家超出計劃多交了一百五十萬普特以上的穀物。同樣提前完成了土豆的徵收計劃和動物油的出產量。在鄉村裏在一年中建築起了六萬八千九百四十八所住宅，佔預定計劃的將近百分之一百一十。

共和國的組織領導了廣大羣衆爲提前完成戰後五年計劃而鬥爭的社會主義競賽。達到了黨的組織工作及政治工作的某些改善。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增長起來了。黨的機關改善了其對共產黨員的馬列主義教育及幹部工作的領導。在學校中、講習小組中、黨的教育系統中，甚至有大部份共產黨員也自

動的研究馬列主義理論。設立並開辦了一個二年制的共和國黨校，十一個馬列主義夜校，二百一十一個區的夜習黨校，二千五百個政治學校和其他的等等。居民中羣衆政治工作的水準大大地提高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着嚴重的破綻和缺點的。生活給我們提出了巨大的任務，要求進一步改善黨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要求鑽研領導工業和農業的方法。

白俄羅斯許多黨的組織還沒有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澈底地改造自己的工作，在我們實際工作中經常有這樣的事實，就是把一些不屬於自身的經濟組織和經濟機關的職權包攬在自己身上。這樣就勢必包辦代替國家的和經濟的機關，並把黨的機關變成無所不管的處理經濟工作問題的行政管理機關。教育黨的組織怎樣正確的結合黨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我們還作的很少而且作的不好。

我們應該以斯大林同志關於在工作中在實際情況中不能把政治和經濟分開的指示作為經常的領導原則，因為在生活中政治和經濟經常是共同存在並一塊活動的。斯大林同志說：『誰要想在我們實際工作中把政治同經濟分開，想以減少經濟工作的代價來加強政治工作，或者相反以減少政治工作的代價來加強經濟工作，誰就勢必要碰釘子。』布爾塞維克主義是唾棄那種迴避經濟工作，迴避經濟任務和忘却黨的政治工作的現象；共產黨員是和狹隘的事務主義者沒有姻緣的。

在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中有許多平行主義者，他們經常混淆自己的職責，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共和國部長會議過多的發佈了共同的決議，這些決議經常是實際上並沒有必要的。其中

有些決議直接推動地方黨的機關去包辦代替蘇維埃的經濟機關的工作。

我們給地方黨的機關主要的是在經濟問題上發出了數量繁多的決議、訓令和指示，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成份在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部門中及其領導工作者中間還沒有根絕。

這些缺點在不久前召開的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全會上曾被以布爾塞維克的直言不諱的精神及不可調和性加以揭露。全會的參加者正確的批評了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把黨的組織及黨的政治工作問題作為自己工作的中心。

我們現在主要的任務在於鞏固地方黨的組織，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使他們能夠對當地國家機關及經濟機關的活動實行黨的監督，批評並剷除在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執行自己在羣衆中的政治及組織作用。

在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及白俄羅斯共和國部長會議工作中發現的缺點，並非少數而是在很大範圍內屬於一些省的區的黨委會及勞動代表的省、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非常遺憾的，在我們這裏，有一些黨的省委會在進行一個經濟及政治運動時，完全不利用黨的及非黨的積極份子的廣大集團去參加這些運動，也不依靠黨的基層組織。

一些省委經常在解決一些經濟問題時包辦代替省執行委員會（指政權機關——編者）的工作。譬如：波勞茨基及格勞德涅斯基的省委實際上取消了省執行委員會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他們忽視

了黨的政治工作，而把自己變成一個行政管理機關了。這一點對我們的事業帶來了浩大的損失。黨的機關把一些日常瑣碎的經濟工作包攬在自己身上，而本身却沒有爲進行此一工作所必須的機構和專門人材，沒有進行該行工作的足夠知識，而同時，擁有龐大機構及部門的省執行委員會却工作得毫無生氣。

就拿徵收木材作例子吧。我們共和國在完成國家這一極其重要的任務時是落後了。其所以如此，是因爲一些黨的組織沒有很好的領導木材徵收工作。省黨委把一些徵收木材有關的工作：如組織勞動力，物質技術保障，集中及運輸的任務分配，對運輸工具的關心，及所有應該由蘇維埃的及經濟的機關作的日常瑣碎事物的解決，都獨攬在自己的肩上。如像實現對這一極其重要的運動的政治指導，對經濟人員活動的組織監督，對黨組織的工作審查等應該是省黨委及區黨委執行的工作，他們却把它置諸腦後了。

從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現在我們的頭等任務在於最終地根絕這種包辦代替蘇維埃的及經濟機關的有害的作法，並集中注意力於發展經濟的主要問題，和開展黨的政治工作。

斯大林同志教訓我們說：布爾塞維克式的領導經濟機關的方法在於「有系統地鞏固這些機關，並不是超越其上，而是經過它們去領導生產」。假如蘇維埃的或者經濟的機關担当不起提交給他們的任務時，倒應該不是去包辦代替它，也不是去解除他們的職責，亂插一脚，而是鞏固它，派幹部去幫助

它。黨的組織也可以此提高地方蘇維埃——作爲一個國家政權機關——的經濟組織者的及文化教育者的作用。

最近以來，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實現了一些鞏固區黨委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尙遠感不足。我們很少教育區黨委以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作風。很多的區委沒有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少共團組織。沒有依靠廣大的集體農莊的和蘇維埃的積極份子。這樣的區委對集體農莊的生活很不熟悉，經過所謂『代表路線』的這種根深蒂固的不正確的領導機構使區黨委和黨的基層組織隔絕了。這些區黨委的領導者，時時刻刻以行政管理來代替組織工作，他們是以經濟工作人員的方法辦事，而不是以政治工作者的作法辦事。

鮑普魯斯基省的斯魯茨基區可稱爲不壞的一個區。就在這裏也很明顯的表現出了黨領導的缺點。區黨委主要的解決目前帶運動性的問題時，解決得很浮皮表面。區黨委陷入了這些運動的事務中而却不去處理真正的黨的政治問題，他的領導者看不到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不認真研究集體農莊的經濟，對本區居民的文化生活問題毫無興趣。在區黨委的工作中，沒有明確性，沒有計劃性，和區執行委員會的職權混淆不清。

不久前區執行委員會討論了在該區預防火災的實行辦法。過了幾天後，同一個問題又提到區委會來討論。二月廿七日，區委會聽取了拖拉機供給站經理巴烏馬斯基關於同集體農莊簽訂合同及修理拖

拉機的报告。次日，同一問題又提到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去討論。此類情形也經常發生在鄉蘇維埃主席中間：今天在區委會上作了報告，明天又到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報告，而講來講去，還是講的那一個問題。斯魯茨基區黨委的缺點也一般的象徵着其他很多地區的情形。許多的區黨委忽略了共產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忽視了鞏固黨的組織及用一切方法擴大勞動人民中羣衆政治工作的任務。這些區黨委把全部領導黨的基層組織歸併到領導日常經濟運動中去了。

不久前在我們這裏召集了區、市黨的總結選舉代表會議。這個會議揭露了很多黨委會工作中的缺點。代表們指出了應以治本的方法來改善黨的政治工作之必需，他們批評了那種有時是不必要的亂派代表到下邊去的不正確的作風制度。代表們指出了在黨組織的領導中存在着有害的文牘主義及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

我們應該堅決的消滅所有這些缺點。黨的組織應該是培養勞動羣衆共產主義精神及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的政治的組織者和教育者。問題是在於要使黨的機關領導者的注意力轉向在羣衆中去作工作。我們要以加強所有黨的工作的辦法達到此點，並提高黨組織的思想生活水準。

在白俄羅斯勞動人民面前，在一九四八年——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有決定意義的一年，擺着很重要的任務。

我們的工業同去年比較，應該擴大生產百分之四十八。本年度將要投入將近一百萬盧布的資本，

事實上大大的超過一九四七年所投入的數目。應該達到不僅僅要使工業企業生產不要虧本，而且應該生產出新的利潤，一天的發掘新的生產資源，改造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和機械化，找到新的改善勞動組織和銳猛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的道路，以便日復一日的提高產品的質量，實現最嚴格的經濟制度應該成爲保障經常有系統地減低產品成本的各企業的工作法律。應該加強注意於居民物質、文化要求的充分的滿足，更多的關心人民的需要和勞動人民的物質的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設備。

我們在一九四八年，應該更堅決的爲更進一步實現聯共黨中央二月全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斯大林的戰後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的計劃。今年春天將要在集體農莊中擴大播種面積達百分之十八點三。白俄羅斯今年穀物播種已經可以達到戰後五年計劃最終一年所預定的水準了。同樣的計劃着擴大土豆、亞麻、和膠樹的播種面積。我們在農業中主要的任務就是用一切方法爲穀物及技術作物的提高而鬥爭，爲社會公有畜牧的繁殖而鬥爭，爲集體農莊組織的及經濟的鞏固而鬥爭。

爲了光榮的担負起這些任務，黨的組織應該完全掌握要求結合黨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作風。黨機關的領導方法應該每時每刻發揮共產黨員及廣大勞動羣衆的自動性與積極性，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的自覺性，以便他們能够提高我們幹部對剷除工作中缺點的責任感，以便保障加速今後走向共產主義道路的速度。

黨的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成功的基礎

近幾年來達吉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大大地發展起來，出現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農作技術提高了。共和國的勞動人民順利地完成了戰後五年計劃頭兩年和一九四八年前三個月的任務。

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全民競賽的情況下，要求黨的組織工作和黨的政治工作更進一步的加強，要求黨的領導水準更進一步的提高。

不久以前達吉斯坦黨的機關進行過的總結和選舉，明顯地表現出，對黨的領導者們產生了如何的要求。

在基羅瓦巴特區的黨代表會議上，區委第一書記麥堅切夫同志的工作受到了嚴正的批評。區委書記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不依靠基層黨的組織和黨的積極分子，忘掉了在羣衆中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他覺得自己是行政上的唯一首長，他以老早就已經陳舊了的並爲黨所唾棄了的方法去領導。不去實行政治領導，區委書記把一切生活瑣碎問題的解決攔在自己身上。

結果基羅瓦巴特在共和國內成爲最落後的一個區。新的區委和區委書記被選舉出來後，共產黨員們要求他們堅決地轉變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以黨的工作配合經濟工作任務的完成。

應當指出，麥堅切夫類型的黨的工作人員，在我們這兒只是特殊的情形。各地方黨組織的絕大多數領導者都是能正確地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實現黨的路線，善於組織羣衆，克服各種困難的人。

屬於這一種黨的領導者的人們，例如奧爾東尼基節阿巴特區的區委書記，現在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阿布杜林同志，他不久以前曾在『真理報』上詳細地敘述了關於黨的工作的經驗。

得扎爾金·扎節同志做了二年的區委第一書記。列寧納巴特區的經濟是異常多種多樣的，棉花是主要的農作物。該區有許多卓越超羣的植棉名手，這些人中如布拉特、包包加林諾夫、米露瑪爾、尤奴索夫和其他等人。他們都配稱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高尙稱號。在集體農莊中有大的牧畜羣，高度發展的菓木園藝和蠶桑業。在區的地區內分佈着重要的工業企業。

由於正確的領導，該區許多部門的經濟順利地發展起來了。去年長纖維棉每海支脫（一海支脫等於中國十六畝）平均收成爲二千五百四十公斤；公共牧畜業的發展和繭業大大地超過了任務；所有的工業企業都超過了全年計劃。列寧納巴特的區委和其第一書記得扎爾金·扎節在這裏是有很大的功績的。

得扎爾金·扎節同志善於把大量的積極份子團結在區委周圍。他了解一切植棉名手，植棉名手也

了解他。區委的力量就在於同羣衆的牢固的聯系。因爲春寒，列甯納巴特區在去年陷於嚴重的情況中了，這裏大片的土地必須重新播種。由於共產黨員爲提高收穫量而鬥爭之巨大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一切集體農莊的莊員們情緒都提高了。以黨的組織和一切集體農莊莊員們的努力，獲得了棉花的高度收穫量。

在去年共和國的許多其他地區同列甯納巴特區一起獲得了很好的成績。四個區委書記榮獲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

在所有黨的代表會議上，特別注意了區委，市委和省委的領導工作方法的改善，黨的工作經驗的總結。共和國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作方法，就是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不久以前進行的全會所研究的課題。必須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指出，我們共和國黨的領導工作人員們，至今尚未充分明顯看出：以黨的機關包辦代替蘇維埃的經濟部門的工作，在對經濟的政治指導方面，表現了極大的消極作用。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作了許多日常經濟問題的決議，而這些問題共和國部長委員會是完全可以單獨解決的。我們常常實地執行了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和共和國部長委員會共同的決議。我們經常不注意中央某些領導者祇是沾沾自喜於一切經濟工作的瑣碎事情。

最近達吉斯坦中央開始糾正了這些缺點。現在，對一些日常經濟問題的決議照例是由共和國部長會議去作，中央局給各地方黨的機關發出指示，監督這些決議的執行，圍繞這些決議的執行展開廣泛

的黨的政治工作。

這種領導方法給予黨的機關可能更深入地研究蘇維埃機關和經濟部門的工作，更加有效地監督和指導他們的工作，研究各種重大問題，從政治上去評價各種現象。當省委、市委和區委停止了他們包辦代替經濟機關，取消了對這些機關多餘的瑣碎的監督之後，在各省和各區裏就產生了更多的積極分子，幫助各級黨的機關履行各種預定的措施。

成百成千的各種專業的工作人員都對委託給他們的一定的專門負責，如果一切部門、一切工作人員、一切專家，都友誼地、確切地和協調地工作，如果一切共產黨員都積極地參加政治工作並以實際行動履行其先鋒作用，十分自然，省的區的工作是會進行得順利的。

黨的組織所實行的各種措施，只有吸收廣泛的（而不是狹隘的）積極分子參加，才能獲得成績。如果黨的積極分子，一切農莊和集體農莊的積極分子，各省的、區的蘇維埃政府和經濟機關的領導者都能以身作則地實地參加為高產量的鬥爭，那麼就可以有保證地說，這種收穫量是能夠獲得的。

省委、市委和區委書記，如果他包辦代替了蘇維埃和經濟機關的工作，取消了成十成百熟悉自己事業的專家的積極活動——這種領導者所注意的，就像一個指揮手不去指導管絃樂團的工作，而去作所有音樂家們所能作的事情一樣，那麼，其結果就會相反。

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不是減少黨的組織對經濟工作情況的責任心，而且恰恰相反，要經常加強

這種責任心，並且要求各級黨的機關要有更加深入了解情況，更有效的領導，對剷除缺點要有很大的機動性。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要求黨的領導者有鞏固的理論素養，廣闊的視界，實際的經驗和與人們一起工作的技巧，並能把成百成千的積極分子團結在黨的機關的周圍。

這不是一切人都能辦到的。我們還有這樣一些黨的領導者，這些人繼續老一套去工作，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方法比一切方法好或者習慣於這種工作作風，而是因為根據新式方法去工作更加困難的多，而且對於按新的方法去工作，必須要掌握確實的材料。政治領導者必須不僅是優秀的實際家，而且是政治家，他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和一般文化素養，俾能成爲有能力解決領導經濟和黨的政治工作之複雜問題的人員。

黨要求黨的工作人員是能創造的工作人員，他要善於分析各個地區事情的狀況，善於集中注意力於各種主要問題上，據有預見的才能。所有黨的領導的這些品質，現在都具有巨大的意義，它們，這些品質，我們必須以此來培養我們的幹部。

不久以前我們同庫爾干·玖濱區委書記巴拉莫諾夫同志進行了談話。巴拉莫諾夫同志這樣懇切地把區委的任務同今春的新情況聯系起來談到：

——今年春季不像往春。如果在一九四七年我區是在四月十一日植棉，而於五月初在大部份土地上已開展其次的耕種，那麼今春要遲二十至二十五天。新的情況要求區委，以及基層黨的組織以新的

一套去佈置工作。

的確，庫爾干·玖濱區委表現出了在今年組織農村經濟工作的偉大的遠見和實際效果。春播要求播種最大限度要在十五至二十天完成。區委，基層黨的組織和經濟機關共同考慮到了一切細節，準備了在盡可能縮短的期間完成播種的一切工具。棉花的晚種同樣要求更多的進行耕作，並要求其兩次之間距離時間的最大限度的縮短，而質量則要大大的提高。區委，基層黨的組織及時地作出了行動的戰鬥計劃並順利地實現了這一計劃。

現在區委和基層黨的組織發動了集體農莊間的、各突擊隊間的、各組間的及農莊莊員間的競賽，製定了社會主義職責之執行的互相檢查計劃。這種檢查的第一步已在播種期間實現了。區委和基層黨的組織此時展開了巨大的政治和組織工作，以剷除由互相檢查而揭發出來的缺點。

在今年我們已不再派遣經常性的全權代表赴各區工作。經驗證明許多時候他們約束着地方領導者的主動性，降低了他們的作用和威望。

爲了指導，爲了予以幫助，我們定期地把共和國的和省的一些領導工作人員派到各區，這些人周密地了解各地情況，可以告訴他們應當如何採取辦法克服缺點。但是現在各地方的領導者自己要實現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和省委的工作人員共同製定的措施了。我們也可以給下層工作人員以幹部政治學習和一般文化學習，經驗的傳達，舉辦各種重要問題的專門臨時訓練班及各種會議之組織路線

的幫助。

達吉斯坦是我國巨大的產棉區，一九四七年共和國之子棉的總採集量在蘇聯佔第二位，而產量則佔第一位。向國家繳納棉花的計劃是大大地超過了。在進入新的農業年度之際，達吉斯坦植棉者們預約在一九四八年要大大地超過在五年計劃之最後規定的棉花產量和總採集量的任務。為爭取這些任務的實現而鬥爭，是達吉斯坦黨的組織之主要的任務。

在我們共和國穀物的生產是落後的。現在黨的組織正在研究這一問題，以便提高這一經濟部門，而且在今年穀物的產量將要大大的提高。

牧畜、蠶絲、菓木在共和國的經濟中佔着很大的比重。我們給自己規定的當前的任務，也要在這些農業經濟部門中大大超過一九四八年的任務。

達吉斯坦工業的工作人員們預約在五年計劃中之第三年生產品計劃於十一月一日前完成。前三個月的總結說明了許多的企業和工業部門都順利地完成着自己所受領的任務。

我們知道，要解決戰後五年計劃中有決定意義的第三年所規定的任務是與黨的組織工作和黨的政治工作水平的總的提高有密切聯系的，是直接地依靠幹部教育工作的加強，依靠分別的對待每省、每區、每個集體農莊、每門企業的態度而決定的。

我們要求共和國黨的工作人員在解決一切大小問題中，要具有高度的原則性。他們必須經常以政

治領導者所必須的一切品質去教育自己。黨的領導者必須成爲一切共產黨員，一切勞動人民的榜樣。歷史上再找不到像我們布爾塞維克黨這樣有威望的黨。在我國所經歷的偉大考驗中，黨多次地證明了她是保衛人民的利益，是同人民相親相近，是同廣大的勞動羣衆緊密地聯系着的。成爲這樣黨的黨員，其光榮和職責是偉大的。

（付克譯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真理報）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在現在正在進行的黨代表會議上，提出許多有關黨的工作方法的問題。被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關於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問題。

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是社會的積極的改造者。它以幫助黨的、蘇維埃的及經濟工作的幹部，理解他們自己的經驗，用他們自己的經驗教育他們，幫助他們糾正和預防錯誤，教育他們如何組織羣衆執行黨的指示。

如果黨的組織不去認真的集體討論問題，不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黨的機關與基本組織，與廣大的黨員羣衆聯系不夠，那末就不能真正去領導。只有黨的領導幹部在黨員方面經常感到自己是對他們負責的，只有遵行黨內民主及黨委工作制，開展自我批評，真正的政治工作幹部才能產生和發展。

在黨的實際工作中，有許多集體工作的形式，保證着廣大的黨員羣衆積極參加決定問題及執行這些決議。黨委制則首先就是說集體想辦法、作決議，無論怎樣有經驗的領導者，就拿省委或區委書記

來說吧，僅憑他一個人的經驗和知識也不足以從各方面都考慮周到，以製訂此一或彼一問題的正確決議。斯大林同志說：個人的決定往往是或幾乎往往是片面的決定。

只有在全體黨委委員實際參加討論和製訂計劃的條件下，正確決定問題才屬可能。黨機關的任何一個決議，都應當依據多數人的經驗，它應當是集體創造的結晶。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缺少這一點，如果一個人就作決議，那我們就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犯最嚴重的錯誤。正因為每個人都有糾正他人錯誤的可能，也正因為我們能接受這些糾正，我們的決議才能逐漸地正確。』

所以某些黨的領導者們，破壞黨委制決定問題的原則是不可容忍的。某一區委書記認為自己是行政管理者，他常常以個人命令和指示代替集體討論和集體決定問題。舉這樣一個例子，在列勞里新黨代表會上（阿爾泰特別區）代表們說，區委書記希洛夫同志不考慮黨委委員們的意見。或者舉這樣一個事實，烏里揚諾夫省密列吉斯區委書記傑民同志，處處剝奪區黨委委員的職權，不考慮普通黨員的意見，傑民同志經常個人決定問題，在成為事實之後再告訴其他委員。一切事情他都一把抓，他的基本工作『作風』是官僚包辦。區委委員們害怕破壞他們和第一書記的關係，默認了他的要不得的工作方法。不久前召開過的區委擴大會上，將這個幹部撤消了其第一書記的職務，是完全作得正確的。

這類不理睬集體意見的黨的工作者。因而就和黨的羣衆對立起來，他們忘記了政治領導人不是以行政權力而是以自己的威信、深思熟慮的提議去影響他人推動工作。而這是要靠處理問題的學識，善

於聽取本機關團體成員的意見，說服他們，依靠他們來取得的。政治領導與行政管理工作不同。它要求領導者要盡許多的努力，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及善於團結幹部於自己的周圍的能力。黨的工作中的官僚管理除危害我們的事業以外，絕無其他好處。它不是表現領導者的力量而是表現他的軟弱。

領導上的黨委制，就是說，一個組織的全體成員都被吸引到積極緊張的工作中來。所以黨委開會時，如有多數委員缺席，那是不能容忍的，這種降低黨委作用的事實，在基洛夫市聯共（布）莫洛托夫區黨委會已經發生了。在這裏經常開多數委員不出席的區黨委會。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開的區黨委會，七個委員只有三個出席。在這些會議上通過了吸收聯共（布）黨員。批准區黨委工作計劃，在勞動組合『阿爾其爾』（化學家）決定建立基層組織等這一些很重要的決議。另外一些專門問題討論會，也在多數黨委不出席的情形下召開過。在伊凡諾夫省卡佛里洛沃巴沙德區，還有比這更出奇的事，今年一月九日召開的區委會，只有兩個委員出席就開了。實際是區委書記阿洛夫同志一個人決定了所有的問題。

用徵求黨委意見的辦法通過重要決議的作法，是破壞黨委制的一種形式。例如聯共（布）摩達維亞中央局用徵求意見的辦法通過了以下一些決議：『黨領導共和國發展電力化的決議』，『關於中等學校教授倫理學及心理學的決議』，『關於固定共和國集體農場及拖拉機站中農業專門幹部的決議』等等。鑑定幹部往往也是徵求意見的方式。這類事實有許多其它黨的組織內也同樣存在着。

有些領導人認為，徵求意見通過決議似乎表現着領導的效能。實際上這種方法沒有任何效能，只不過是表現了對待問題的官僚事務主義態度。當然，某些無須討論的問題可以徵求意見決定，但是最重要的決議必須在集體領導的全體委員討論的基礎上通過。徵求意見的辦法破壞着黨委領導制，縮小着領導集團中每個成員們的職權，削弱着他們集體工作的責任感。

集體領導就是進一步，隨時地接近黨員，傾聽下級工作人員的意見，依靠黨的羣衆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們，領導者的眼界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他們是從一方面，從上面觀察問題。相反的，羣衆是從下面觀察問題，他們的眼界同樣也是有局限性的。為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必須結合雙方的經驗，只有這樣，領導才會正確。

各個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參加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如果黨委會及積極份子會組織得好的話，它們就能使領導人運用這些工作人員的經驗，在布爾塞維克批評的基礎上揭發缺點，給該組織的活動指出正確的方向。但是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就是如黨委擴大會及黨的活動份子會，降低到教訓領導幹部的學校的時候，這就必須糾正。這些會議不是每個地方都經常召開。如聯共（布）烏茲貝克斯坦中央全會，在一九四七年僅僅開了一次，布列安斯克省伯熱采市委在去年十個月中也祇開過一次擴大會。沃洛諾克斯基區委保爾加及布列安斯克省其它區黨委的擴大會也召開的不多。在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上的嚴肅地討論問題，有時為鋪張形式所代替，會議被用來大演其講，而批評及自我批評則平

靜無聲息，黨委工作制要求領導人善於聽取全體委員的意見，考慮他們的建議，勇敢地接受對自己缺點的批評。他不能認爲批評指責有損自己的威信，不得把個人自尊心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斯大林同志說過：『善於集體行動，個別同志的志願準備服從全體的志願，這就是我們布爾塞維克的真正勇敢。所以，沒有這種勇敢，不善於克服（假如你願意的話）自己的自尊心，並且服從集體的意志——沒有這些品質，就沒有集體，就沒有集體領導，就沒有共產主義。』

黨的領導人應當成爲布爾塞維克對待黨員批評及正當指責的模範。然而某些領導對批評兵刃相加，認爲它是『對個人的侮辱』，是『威信的損害』。在伏諾希洛夫省的黨代表會議上，代表們在幹部問題上，對省委書記也姆欽科同志，作了嚴格的適當的批評，他在自己的發言中打擊代表，並將幹部工作亂無頭緒的責任加在下級黨的工作人員身上。新西伯利亞市委委員布拉希列夫同志不承認對自己工作的批評，而斥責發言的代表，說他們似乎『無所事事，專以批評爲能事』。

也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似乎同意批評，傾聽指責，表面上準備勇敢接受批評，但在實際上，他不採取任何辦法，實行那些會議上提出來的問題。這種對待集體意見的態度，其害處並不亞於直接了當的不願考慮意見。二者結果相同：降低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及其糾正錯誤的責任心。

黨委工作制並不是說任何問題都要提到會議上解決，如果它不需要討論，也可以個別處理。在這些情形下，此一或彼一組織的領導人，不要害怕負責決定問題的責任。但是必須注意黨委工作制，集

體討論並決定問題，絕不是取消，而相反地，要提倡每個委員的個人負責制。

列寧教導我們說：『……我們須要個人負責制，正如討論基本問題需要黨委制一樣，爲了及時解決問題，爲了不推脫責任，我們同樣需要個人負責制，個人處理問題。』辦事必須嚴格分清歸誰負責，必須與對待這一問題的權稜兩可、似是而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負責任的現象作無情的鬥爭。

爲使黨委領導制不流於空談和紙上談兵，每個黨委必須負起委託於自己的責任，嚴肅進行執行決議的組織工作。工作中還有這樣的黨委委員，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坐下來開黨委會，參加討論問題，並認爲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責任。黨委全體委員的責任乃是關懷已通過了的決議之命運，不屈不撓的爲實現而鬥爭。

集體領導的方法是黨的工作之基礎，它是培養黨的領導幹部的最重要的辦法。黨的積極份子愈是廣泛地參與黨領導機關的經常活動，它就愈能迅速地受到布爾塞維克的教育，擺在黨組織面前的任務就能感完美的解決。破壞黨委工作制原則應被視爲是束縛黨員羣衆的創造性及自動性的官僚主義的表現。

布爾塞維克黨是在牢不可破的黨內民主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的黨章規定了廣泛發揚每個黨員及候補黨員積極性的條件，最嚴格的遵行黨內民主，黨委工作制原則，使我們能够正確的培養領導幹部，幫助我們不倦怠地提高黨的組織，對國家的及經濟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水平。

黨的會議是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學校

黨的會議是黨的基層組織之最高機關，同時也是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學校。黨的會議可以從思想上武裝共產黨員，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和團結性，提高黨員對組織的責任感，並可以使每個黨員感覺到，他是統一的組織中的一分子。

區黨委應認真注意籌備和進行黨的會議的問題。區黨委應發揚黨組織提問題的主動性與自動性，而不應拿上級所提出的問題去規定一切黨的會議的議事日程。若在議事日程中僅只提出上級指示的問題那就會使黨的會議的進行官僚化。

在許多組織中所進行的黨的會議，使共產黨員對下列問題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此即『列寧、斯大林關於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與生產發展的速度』，『論對勞動者的共產主義教育和反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的鬥爭』。這些會議之所以收到如此效果是因為事前都有充分的準備。區黨委分配了很多有修養的同志作報告。

仔細的準備這些會議，就可以使這些會議變成黨組織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這些事件乃是共產黨

員所期待和最關心的。這些會議可以給黨的組織工作以重大影響，促進全國生產的高漲，提高共產黨員對自己實際工作經驗作理論的綜合研究的興趣，並在許多方面幫助提高黨員在生產與社會生活中的先鋒作用。

在會議籌備過程中，車間的黨組織對共產黨員思想教育教育工作顯然活躍起來了。進行了小組和個別談話，組織了書報展覽會。在準備討論會，討論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時，列寧肉食聯合工廠的黨員，會讀了許多馬列主義關於這問題的古典著作。雜誌報章上關於這問題的論文。耶果羅夫車箱製造廠黨的組織會與修養較差的黨員及候補黨員進行事先談話。在第二『無產階級勝利』鞋工廠則全體大會前舉行廠間黨的會議。

願意在大會上發言簽名者已達八百多人，並提出七百九十個問題。這一事實證明黨員的積極性。區黨委根據此項經驗，便給各個黨組織介紹了些座談的補充題目。

討論列寧和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與生產發展速度的學說的會議，也作了縝密的準備。在黨的會議上。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廣泛促進了競賽範圍，以及糾正其組織內的缺點。基洛夫『電力』工廠有組織和鄭重地開過了大會。黨委為準備大會的材料起見，會吸引了許多熟習企業中的社會主義競賽組織的黨員參加。開會前夕刊行許多雜誌報章和牆報，組織展覽會，在圖表和橫布聯上說明工廠與個別廠間的工作情形。關於開大會及會議日程都預先通知了全體黨員。為執行會議決定，黨員還須積極進行

爲達到新定額和動員全體工人提前完成計劃而奮鬥。

石綿工廠爲了召開黨的會議，那天工廠牆報會出刊了一張專號。在工廠的大會禮堂內掛有標語口號，號召完成自己所擔負的任務，組織學擊黑板報（貼有優秀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照片）。籌備會議時共產黨員擔負着新的，更大的任務，在許多生產部門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大大增加了。

黨員於籌備會議期間，曾細心地研究了列寧和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的指示。聯共（布）許多黨員閱讀了列寧巨著『偉大的開端』、『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以及其它等等。

在炭氣化工廠，『紅色裁縫師』工廠，第一市立發電所的各個黨的組織會議上，黨員們在其發言中已會把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的原理同企業的實際工作聯繫起來。

適合時宜而嚴肅的準備了工作，全體黨員羣衆都積極的參加大會工作，促進了這些大會的順利進行。這些會議幫助教育了每個黨員對企業工作和黨員的組織工作高度責任感。在第一屆關於社會主義競賽大會上，區委邀請其他黨組織的書記參加，爲讓他們能够吸取優良經驗並能指出籌備及進行黨支部大會中的缺點。

大會所通過之決定對改善企業和組織競賽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列寧肉食聯合工廠根據黨員的建議爲實行合理化的人以及發明者成立了辦公室。爲了實現大會之決定，鄂涅深電車庫的黨組織幫助經營

者建立技術研究室和調整其工作。

區黨委根據黨員意見，召開了完成一年計劃的斯達漢諾夫工作人員會議。該會議幫助黨的領導者同本區的先進者建立更密切的聯系，揭發現存缺點，且動員全體勞動者加緊克服缺點。

目前該區已有四千多工人已完成了今年的生產定額。其中有些人已完成了五年計劃的定額。在已着手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的工作的生產革新者中間，有「電力」工廠的模型製造工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郭茨洛夫同志，和「疾行」工廠的優秀斯達漢諾夫式的工作者聯共（布）候補黨員米海洛夫斯基。最近有三百多先進的工作隊已榮膺「十月革命三十週年工作隊」光榮稱號。

不久前在這裏曾舉行了黨的會議，討論了「關於對勞動者的共產主義教育和為反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而鬥爭」的問題。根據什麼選擇這樣的會議日程呢？因為在我們中間還存在着許多這樣的現象，即有些人總企圖少給國家繳納些，而自己從國家手中多得些。還有生產上的貪婪者，二流子以及浪費者。而部份知識份子中間直到現在尚存在着對外國事物盲目的崇拜。黨組織必須同這些過去的殘餘作堅決的鬥爭。

「疾行」工廠中除去那些奮不顧身的勞動實例外，還有部份工人（其中也有個別的共產黨員）是以非共產主義態度對待勞動的。發言者尖銳地批評黨委會及廠間黨組織在羣衆工作與政治工作中的缺點。揭發了有礙於提高黨員和非黨員政治思想工作水平的原因。

區黨委和黨的基層組織希望每一個黨的會議要教育共產黨員。使他們感覺到組織的力量。這對於那些大部份是新黨員，而在思想上缺乏鍛鍊的黨的組織，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更加注意準備和進行黨的會議之原因所在。

但有些黨的領導者對這項工作是不認真的。我們還有不定期召開會議的事實。凡是黨組織的領導者不懂得沒有黨的會議便沒有黨的工作的地方，便經常發生這種情形。

有時也很少注意會議的準備工作，如不久前區黨委會取消了以舒根同志為書記的某個黨組織的會議。——因為黨員沒按時接到開會的通知，開會地點也沒有準備好，所以到規定的時間僅來了十分之一的黨員。臨開會前才準備決議草案，這一切都表現在討論會進行的不起勁和缺乏自我批評上。區黨委於指出工廠黨委的錯誤後，便責成他們從新召開會議。

或者再拿——關於會議的領導機構問題作例吧。我們時常看到老是那些黨員主持會議。作報告也是如此。比如，在焦炭瓦斯工廠所舉行的十二次會議上都是黨組織的正副書記，和廠長作報告。在列寧冷藏聯合工廠的報告者總是黨組織的書記個人發言。

個別黨的領導者有時企圖將整個會議過程提早就擬出來了：誰講那些問題，誰主持會議，他就忘掉這種會議沒什麼益處，不會發揮黨員的積極性，只會降低自我批評水準。

區委和下級組織竭力想使黨會議成為培養紀律的學校。我們要求黨的領導者一定注意黨員缺席的

現象，並次每都要給這種現象以批評，讓他們了解遵守黨章的要求是基於黨的紀律之上的。

及時通知黨員，會議決定是如何實現的，也是很重要的。我們這樣作，是爲了使黨組織的書記在黨的例會上彙報上次會議決定是如何實現的，是爲的要他們召集那些未能出席大會的黨員，並通知他們關於會議的決定。一個會議當討論問題時却很積極，而通過決定時便拖延到不定的時間那是絕不容許的。當然，這樣的決定會失掉其效果和尖銳性的。

還有這樣的情形，即會議的政治思想水平很低，會議上很少討論黨的生活實際問題，不同黨員談論大會的目的和任務，不引導廣大的黨員羣衆參加會議的準備工作。作報告必須不僅限於黨組織書記、廠長、而要使最廣大的黨的積極份子參加。

區黨委會應該有系統的總結會議經驗，幫助下級黨領導者選擇會議上討論的問題，介紹如何更好的籌備會議，商量決議的性質應當是怎樣的。

黨的會議是在布爾塞維克教育黨員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在大會上積極討論問題，通過決定，可以促使基本任務——提前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第二年計劃的實現。

(任飛譯自真理報)

